

# 明末清初嘉興藏刊刻與江南士族

陳玉女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中文摘要

嘉興藏刊刻是晚明清初佛教史上一大事，歷時近兩世紀，所涉刻經場域、人力、物力、財力之資源龐大，全由僧俗等私人捐資助刻，規模之大，為今昔之最。然由於其耗時、耗財、耗人力，也因此顯現整體刊刻工程推動之不易及過程中遭遇不順遂之實。刊刻工程的不順遂或時而停滯，當然含括諸多複雜因素，本文則側重在究明跨越明清兩代的嘉興藏刊刻事業，於鼎革世變之際，原是積極支援嘉興藏刊刻所需各項資源之極大宗的江南士族，因戰亂波及，致使無數士人身亡或家族面臨崩散、遷徙、流亡之難，如是災難如何牽動著刻藏事業的進展，同時影響對刻藏所能提供的心力。其具體狀況，乃透過幾個自萬曆年間刻藏伊始即已大力投入嘉興藏刊刻，並持續至明末或明清鼎革之際，以及於明末繼起關注嘉興藏的士人或士族案例，確切頗析其起伏變動之情，藉以進一步掌握嘉興藏刊刻之所以費時或延宕甚久、乃至未見全藏刻畢的可能因素。

**關鍵詞：**明清之際、嘉興藏、士族、江南、佛教

# The Carving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and the Patron Families in Jiangnan Area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en, Yuh-ne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Lasting over two centuries, involving enormous manpower and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volving a large area of activity, the carving of the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n Buddhist history. Further, this tremendous religious activity was solely supported by monks, believer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It was certainly not an easy task,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In this period of political upheaval,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project of carving the Jiaxing canon included many powerful families in the Jiangnan area which collapsed or migrated. This led to a crisis due to the suspension of this religious activity. For the sake of creating a more accurate historical account, several such

supporte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utra carving in the Wanli period and from the late Ming are investigated and discussed.

**Keywords:** Ming-Qing, Jiaxing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powerful families, Jiangnan, Buddhism



## 一、前言

嘉興藏是以私人力量發起大規模刊刻大藏經的創舉，由晚明四大師之一紫柏達觀(1543-1630)及其弟子密藏道開（生卒年不詳），同居士陸五臺（光祖；1521-1597）等，有鑑於明藏版的經典流通不如前朝之盛，又多所訛誤，為廣泛流通、方便攜帶閱讀研究，故發起私刻經藏事業。前後歷時之久，南北刻場輾轉之多，以及所投注的人力物資，為歷來之最。其文獻史料價值，被喻為「明清禪宗史研究的「敦煌發現」，是「明末清初的佛教史料大集」，「宋清之間收書最多的一部大藏經。」<sup>1</sup>對明清佛教研究來說，倍感珍貴、不容欠缺。

明北藏為《嘉興藏》正藏刊刻底本，據所載，稱萬曆年間倡議刻藏，「不數年間竟竣其事。」<sup>2</sup>依此敘述，似乎指嘉興藏完刻於萬曆年間。然據其他文獻記載，尚有萬曆末年、順治2年(1645)、康熙15年(1676)、康熙16年(1677)、康熙52年(1713)、雍正末年，或乾隆49年(1784)等各種完刻年代之說。嘉慶7年(1801)《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目錄》，被視為《嘉興藏》收入經書的最終年限。凡此或許涉及《嘉興藏》正藏、續藏、又續藏等各種版本收書之不同刊刻時間，但《嘉興藏》全藏完刻於何時，仍舊眾說紛紜，莫終一是。這正顯示嘉興藏經歷極為複雜多變的刊刻過程。因此嘉興藏究竟完刻於何時，何以有如此不同的說法，探究其發展背景與歷史因素，亦是解析明末清初佛教社會文化的重要環節之一。

I

※ 收稿日期 2017.8.24，通過審稿日期 2017.10.20。

<sup>1</sup> 藍吉富，〈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1991年，頁262。

<sup>2</sup> 釋鐵眼，〈刻大藏緣起疏〉，《鐵眼禪師遺錄》，收入《黃檗鐵眼版一切經》，日本昭和癸巳年(1953)黃檗山寶藏院刊本，頁28上。

拙著，《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第四章 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第五章 江南嘉興藏刊刻各階段的社會資源與願求〉，以臺灣新文豐出版影印的《明版嘉興大藏經》，全 40 冊，收錄 497 種書類中經律疏及諸宗著述之每卷末所附牌記，作為整理刻場、施刻者、刻工、書工及校對者之區域分佈，以掌握嘉興藏刊刻所需財力物資的取得來源，及施刻者、施刻家族的動機和贊助的大致輪廓，可參見同書圖一：「晚明嘉興藏南北諸刻場之社會資源分佈圖(1589-1644)」。<sup>3</sup>此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引起相關研究者的注意和參考，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章宏偉於〈明代萬曆年間江南民眾的佛教信仰—以萬曆十七至二十年五臺山方冊藏施刻文為中心的考察〉中，提到有關嘉興藏於五臺山時期的刊刻研究，「已有不少精彩的論述，特別是陳玉女的〈五臺山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從佛教社會史的角度著眼，頗多新的見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論述五臺山時期《嘉興藏》刊刻的論文佳作，但由於她僅以臺灣新文豐出版的《明版嘉興大藏經》為依據，……收經數量有限，是不能當做全本《嘉興藏》來對待。」<sup>4</sup>

的確，拙著所依據的新文豐版並非全本《嘉興藏》，故於上述議題的探討，尚未能竟其全面的觀察，有其疏漏待補之處。然由於嘉興藏刊刻何時畫下句點，目前學界尚無定說，雖然關注者較前漸增，各館藏版本亦隨之陸續出現，但就各版本之比對，亦難以斷定有部全本或完整的《嘉興藏》刊行。像韓錫鐸據幾處館藏目錄核對後，指出「皆不是全藏目錄，只是某一時期發行的目錄」，「種種情況說明，《嘉興藏》(或《徑山藏》) 沒有一次性發行過全藏，原來各寺院請的，都是不全的，全藏

II

<sup>3</sup> 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 年，頁 244。

<sup>4</sup> 章宏偉，〈明代萬曆年間江南民眾的佛教信仰—以萬曆十七至二十年五臺山方冊藏施刻文為中心的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31，2016 年，頁 111-112。

刻了多少種佛教典籍，是個未知數。」<sup>5</sup>按此一說，有著《嘉興藏》未完刻，亦即刻藏工作未盡上句點的意涵。但是否如此，還需更詳盡仔細的相關文獻搜羅與翻檢比對，始能提出較有力的觀察，藍吉富亦指出《嘉興藏》續藏：「完成年代，是很難斷定的。」<sup>6</sup>可見刻藏呈現複雜、多變與膠著的情形，其實際狀況，尚待進一步詳實的梳理。

為解明上述疑惑，本文試圖從明清鼎革的大變局造成社會震盪、人群遷移及無數家族崩離，對嘉興藏刊刻的具體衝擊予以探究。據拙著研究所知，自萬曆以來，尤其江、浙一帶，不少士族大家傾其家族財力助刻，舉如浙江餘杭嚴調御(1578-1637)、嚴武順(1582-1648)、嚴敕(1583-1652)兄弟；江蘇吳江吳承烈、吳瑞徵、周祖、周祝、周祇、周之琦、周應驥、周應龍、吳士端(1691-1773，吳廷禎孫子)、吳士彥、吳氏、沈令譽、沈令行、沈令謨；江蘇常熟嚴訥(1511-1584)之子嚴澂(1547-1625)、嚴澍、嚴澤、嚴濟等兄弟；江蘇太倉藏書家顧紹芳(1592年前後)、顧紹芳異母弟即顧炎武(1613-1682)、祖父顧紹芾(1563-1641)、顧紹芬夫婦等顧氏家族的支助；江蘇金壇名門望族于玉立、于玉德、于士鰲、于玉鳴兄弟等；江蘇丹陽賀學易、賀學仁、賀學禮等家族；平湖陸光祖孫陸鍾奇與其妻室李氏、側室王氏；安徽休寧縣金時順家族，含其室人黃氏、子繼正、繼美、繼善、繼叢、繼英、繼昌，以及媳婦汪氏、吳氏、葉氏和女兒五弟、寶貝、寶弟、轉弟等諸多家族的鼎力襄助，方使嘉興藏刊刻能夠逐步推移。

而本文所稱「江南士族」的「士族」，乃泛指地方上擁有學識能力、政治勢力、家族聲望和財力的士人家族或士大夫家族，其間亦屬擁有明

<sup>5</sup> 韓錫鐸，〈重輯《嘉興藏》及未盡事宜〉，《刻本大藏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5年。

<sup>6</sup>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刊於《台北版電子佛典集成》，「相關知識」欄，2017/10/25，<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

清研究界所稱之地方仕紳或鄉紳的此一身份。<sup>7</sup>誠如寺田隆信指稱，近世的士人或士大夫通過傳統制度的教育和學習課程加以養成，被稱為鄉紳的人也是屬於士人或士大夫，因此也擁有同樣的學習經歷。<sup>8</sup>隨著明亡，不少上述士宦之家因之家破人亡。康熙年間松江華亭人朱溶述及其父朱紹甲所言：「遭明室喪亂……見諸老先生及士庶死於賊、死於清者甚多，前代所未及」。<sup>9</sup>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朱溶學弟毛奇齡(1623-1713)為《忠義傳》寫序，述及朱溶「生當明季，目擊夫國家之故，北南喪亂，有相繼而死其事者，每憶而書之，久之成帙，遂顏其編曰：《忠義錄》。」<sup>10</sup>明亡造成人間亂離的慘劇，屢見史冊。當清兵南下渡江，江南士庶亡者、逃者紛紛，如述：「清兵渡江，百官大奔」<sup>11</sup>；「清師渡江，是何死者之多也。」<sup>12</sup>

從嘉興藏施刻者的區域分布來看，江南人士所占最多，中嶋隆藏亦確切指出，支持刻藏此事業者，「實質是，位在揚子江下游地區的所謂

II

<sup>7</sup> 賴惠敏，〈士族的形成與興衰—若干個案的研究〉一文，收入中央大學共同科編印《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377-438。賴氏此文雖未明確界定「士族」涵義，然透過此文之研究，可清楚了解士族乃涵括士紳、縉紳在內，本身具備學識能力之外，在政治或經濟上也有其相當的勢力，擁有地方名望，足以左右地方發展。

<sup>8</sup> 寺田隆信，〈第三章 鄉紳像の諸相〉，《明代鄉紳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9年，頁98。另，有關明清地方鄉紳與佛教的關係及相關研究，於拙著《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場域》，〈第一章 緒論〉中曾予以詳述，頁28-30。

<sup>9</sup> 清·朱溶，〈自敘〉，《忠義錄》，收入明·江垓，清·解瑤等撰，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6年，頁387。

<sup>10</sup> 清·毛奇齡，〈忠義錄·敘〉，收入明·江垓，清·解瑤等撰，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頁387。

<sup>11</sup> 清·朱溶，〈陳于階傳〉，《忠義錄》卷3，《明清遺書五種》，頁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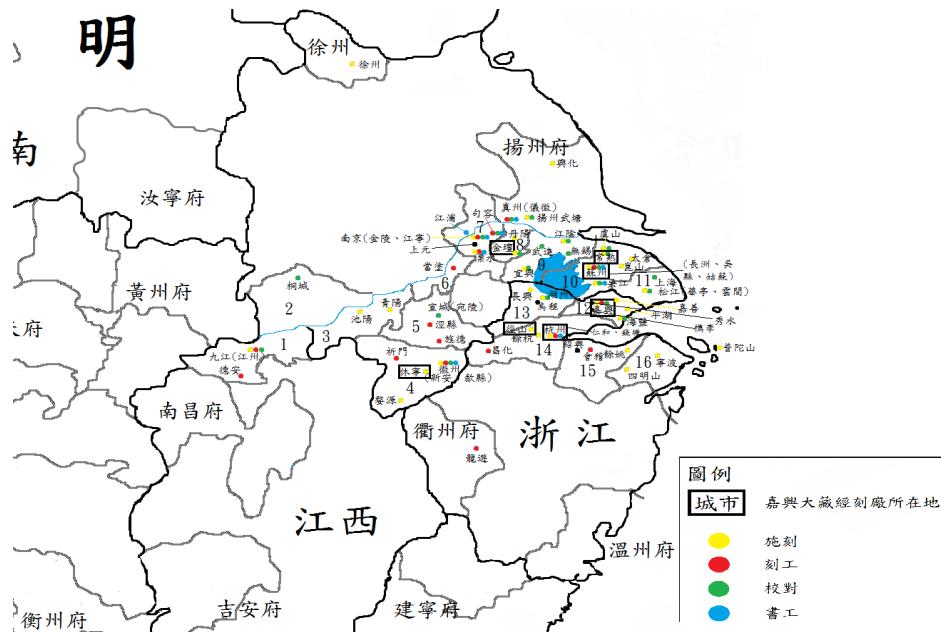
<sup>12</sup> 明·瞿共美，〈五月清師渡錢塘江方國安降兵部尚書張國維死之·附〉，《粵游見聞》，收入《明清史料彙編·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2134。

江南文化圈」。<sup>13</sup>當清兵由北一路往南攻打，位在江南的江蘇金壇金沙東禪青蓮社、金壇城西南顧龍山、武林理安常院、虞山華嚴閣、姑蘇兜率園、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徑山化城寺、杭州寂照庵、嘉興府楞嚴寺、匡山木石庵、一指庵、浙江嘉興三塔寺、徽州休寧縣海陽青淨禪林等多處嘉興藏刻經場，以及歷來較其他地區提供甚為豐沛的刻藏人力和財力資源的江南各地，如南直隸應天府金陵、溧水、上元、江寧、句容、江蒲、松江府的松江、華亭、上海、雲間，蘇州府的蘇州、太倉、常熟、吳江、長洲、吳縣、崑山、姑蘇、虞山、鎮江府丹陽、金壇、徽州府徽州、歙州、歙縣、休寧、祁門、婺源、新安、揚州府揚州、真州、常州府無錫、武進、宜興、江陰、海虞、太平府當塗、寧國府涇縣、旌德、宛陵、徐州府徐州、池州府青陽、安慶府桐城；浙江嘉興府平湖、嘉興、槜李、嘉善、錢塘、仁和、秀水、海鹽、杭州府餘姚縣餘姚、徑山、紹興府紹興、會稽、平江、杭州府杭州、昌化、武林、寧波府寧波、四明、衢州府龍遊、湖州府長興、湖州、烏程、寧波府普陀山等地區，如本文圖一：「嘉興藏江南刻場、施刻者、刻工、書寫者、校對者的分布」所示，在明末清初此一動盪變革時期，其遭受戰亂襲擊，導致眾多江南士

## I

<sup>13</sup> 中嶋隆藏，〈所謂万曆嘉興大藏經の刊刻と馮洪業の助刻活動〉，收入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東京：二玄堂，2004年，頁71。關於「江南」地區，學界有諸多討論，舉如李伯重，〈附錄一「江南地區」之界定〉，《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北：聯經出版，2002年，頁419-432；馮賢亮，〈緒論：江南的概念、環境與社會控制研究的界定〉，《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3；陳學文，〈筆路藍縷的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王家范主編《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1978～2008》，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3-5；范金民，〈前言〉，《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10；徐茂明等著，梅新林、陳玉蘭〈總序〉，《明清以來蘇州文化世族與社會變遷》，收入梅新林、陳玉蘭主編《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叢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1-7。

族的潰散與分離，由此對嘉興藏刊刻事業的實質影響，是本文所欲關注的課題。



圖一：「嘉興藏江南刻場、施刻者、刻工、書寫者、校對者的分布」

### 二、清兵渡江與江南士族的離散

隨著清兵揮軍南下攻城掠地，明朝殘餘勢力節節敗退，前後於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建立維繫大約四十年極為脆弱的南明政權。而清兵的渡江與南明政權的危殆不安，對明清之際江南社會及士人紛擾動盪的影響，學界已累積眾多相關研究成果。舉如錢海岳(1901-1968)前後歷經二十年廣蒐材料，窮畢生之力，於崇禎甲申三百年，即 1944 年完成《南明史》一百卷，<sup>14</sup>修訂工作持續，直到 1968 年，文革開始，被抄家，修

<sup>14</sup> 錢海岳，〈出版說明〉，《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店，2006年，頁5。

訂工作終止。由原來一百卷增加至一百二十卷。<sup>15</sup>自述撰著原則：

本史以南渡為斷，凡人事在崇禎十七年四月以前及三朝畔降諸臣清史有其傳者，皆不列，惟白文選之盡瘁勤王，錢謙益之響應義旅，鄭芝龍、孫可望、劉進忠關繫隆、永、臺灣存亡，貳臣、逆臣傳於明事不詳，茲不得不為補傳。<sup>16</sup>

錢海岳撰寫時期，適逢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壓境及日本的侵華，故站在補全明代後史以激起民族大義的觀點，進行南明史之書寫。

謝國楨(1901-1982)亦因著前述南明史撰著時代背景，極為關注明清之際的歷史研究與典籍之考訂。其《明末清初的學風》，〈(五)清初東北流人考〉，描述清初「為了維護它的統治政權把無辜的江南和河北的人民，硬加上罪名，拓荒流徙到東北去」<sup>17</sup>的政策，亦深深牽動著江南士人的命運，迫使無數家族離散，過著悲苦的生活。<sup>18</sup>而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南明史 *The Southern Ming*》，<sup>19</sup>詳述清朝征服江浙一帶，士庶或抗清或屈從等種種面貌。<sup>20</sup>顧誠的《南明史》，完稿於 1996 年，<sup>21</sup>史料

■

<sup>15</sup> 錢海岳，〈出版說明〉，《南明史》，頁 10-11。

<sup>16</sup> 錢海岳，〈義例〉，《南明史》，頁 8。

<sup>17</sup> 謝國楨，〈(五)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臺北：谷風出版社，1980 年，頁 117。

<sup>18</sup> 謝國楨，〈(五)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指出清初士大夫被迫流徙遼左，不外乎「一、順治丁酉十四年(1657)科場獄案；二、清初史獄及文字獄；三、清初通海案；四、平定三藩案；五、順治年間之朋黨案；六、雍正年間羹堯隆科多獄案」，頁 122-123。

<sup>19</sup> Lynn A.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中譯版司徒琳，《南明史 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

<sup>20</sup> 司徒琳，〈第一章 首次抵抗：洪光政權〉，《南明史 1644-1662》，頁 1-32；同書，〈第二章 首次失敗：清朝征服長江流域〉，頁 33-58；同書，〈第三章 第二次抵抗：魯監國與隆武政權〉，頁 59-79 等。

<sup>21</sup> 顧誠，〈原版後記〉，《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年。

扎实，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sup>22</sup>同时，又被评价为：「是顾先生潜心研究十数年南明史研究的成果，是迄今为止南明史研究的最高峰。」<sup>23</sup>其他与本文讨论清兵渡江造成江南社会动荡的海内外相关研究，足资本文参考者多，兹不一一赘述。<sup>24</sup>

当顺治二年(1645)四月十四日都镇史可法由白汉(洋)河退守至扬州，闭城禦敌。四月二十五日清兵攻入扬州城，至五月五日，经过十日间的屠杀，百姓悲残万状，史可法幕僚王秀楚根据「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记录二十六日所见。载言：

¶

<sup>22</sup> 顾誠，《南明史》，封底。

<sup>23</sup> 王鐵男，〈以抗清鬥爭為主線的南明史研究新視角——評顧誠《南明史》〉，《湖北函授大學學報》16，2015年，頁90。

<sup>24</sup> 森正夫，《奴变と抗租：明末清初を中心とする、華中・華南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民衆の抵抗運動》，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1981年；黃海章，《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編，《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9年；薛文郎，《清初三帝消滅漢人民族思想之策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年；Lynn A. Struve,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Mich: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年；吉尾寛著，《明末の流賊反乱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店，2001年；趙伯陶，《秦淮旧梦：南明興衰錄》，濟南：濟南出版社，2002年；丁志可主編，《明朝遺民的大清歲月》，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發行，2008年；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馮玉榮，《明末清初松江土人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2012年；南炳文，《南明史》，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福本雅一，《明末清初》，京都：藝文書院，2012年；Harry Miller, *State versus Gentry in Early Q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年等。

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至夕，……躡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為誰？俯尸遍呼，漠無應者。……城下積尸如鱗，數蹶，聲與相觸，不能措足，則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驚，即仆地如殞尸，久之始通於衢。<sup>25</sup>

王秀楚目睹並親身遭遇揚州屠城的殘狀，百姓陷入煉獄般的惶恐與不安，此一動盪，致使「富賈巨室皆潛遁他方，城中遂虛。」<sup>26</sup>

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戰敗，透過世居徽州休寧的金聲(1589-1645)傳記，看到徽州鄰近一帶之土家大族，遭受清軍渡江襲擊，導致個人身亡、家庭離散和破碎的景象。<sup>27</sup>金聲曾於休寧縣海陽清淨禪林嘉興藏刻場布施刻經，其家族於清軍南下時遭遇不幸。載言，同年五月九日「南都破，宏光帝出亡，明禮部尚書海虞錢謙益率先降附」，清軍輕易進入江蘇地區。

《江南聞見錄》則記載五月十一日傳言弘光帝出城，「京中文武一時隱遁」，「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者不可勝數」。<sup>28</sup>十二日早開太平門，驅川兵，當時：

阮大铖家被搶，馮可宗、陳盟、王一心、周之嶼、馮夢禎、蔣鳴玉、張元始、姚士衡、沉應旦、吳希哲、陸康稽、葛含馨、

## ■

<sup>25</sup> 清・王秀楚，《揚州十日記》，臺北：廣文書局，1966年，頁232-235。

<sup>26</sup> 明・無名氏，《揚州變略》，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56，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頁20。

<sup>27</sup> 清・朱溶，〈張捷傳〉，《忠義錄》卷3，《明清遺書五種》，頁540。

<sup>28</sup> 明・不著撰人，《江南聞見錄》卷1，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中國野史集成》冊33，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111。

羅志儒、黃哀赤、陳濟生、申縯芳、吳适、顧繹詒、陶廷煜俱去，張捷、高倬、張有譽俱死。<sup>29</sup>

而韓菼(1637-1704)在《江陰城守紀》，稱五月十五日「福王稱號于南都」，大清兵南下，「連克淮揚，直抵江寧，福王奔蕪湖。」<sup>30</sup>「大兵至，士民各書順民二字於門，爭持羊酒迎候。」張岱的《石匱書後集》卷5，〈明末五王世家〉也寫著：

此時清兵南下，淮、揚告急，……揚州一失，門戶盡毀；南京一路，如入無人，馬士英攜家口輜重、歌兒舞女潛遁江南。弘光力追士英不及，誤走蕪湖，遂投靖南營內。<sup>31</sup>

上述清軍渡江後的戰況，據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字濟泰，原名馬爾蒂尼；M.Martini，耶穌會士）以法語著《韃靼戰記》（1654年，翻譯成英文，於倫敦刊出），提到揚州城時，衛匡國說：

韃靼屢次進攻都遭到激烈抵抗，損失了一個王爺之子。這座城由於忠于明室的大臣史閣老（史可法）防守，但他雖擁有一支強大成軍，最後還是失敗，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殺。<sup>32</sup>

順治二年江南薙髮令下，引起士民抵抗。位在內外交通要衝的江陰，是「江以南一劇邑」，面對薙髮令施行時，於同年閏六月一日，「倡義守城」。<sup>33</sup>至八月二十一日江陰城陷，二十二日屠城：

■

<sup>29</sup> 明·不著撰人，《江南聞見錄》卷1，《中國野史集成》冊33，頁112b。

<sup>30</sup> 清·韓菼，《江陰城守紀》卷上，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中國野史集成》冊33，頁117下。

<sup>31</sup> 明·張岱，〈明末五王世家·福王世家〉，《石匱書後集》卷5，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別史類》冊320，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頁453a。

<sup>32</sup> 衛匡國著，何高濟譯，《韃靼戰紀》，收入帕萊福等著《韃靼征服中國史·韃靼中國史·韃靼戰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70。

<sup>33</sup> 清·韓菼，《江陰城守紀》卷上，《中國野史集成》冊33，頁123上。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繯者不能悉記。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菴池裡、教場河、處處填滿疊尸數重，投四眼井者二百餘人。<sup>34</sup>

二十三日停止屠殺，「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sup>35</sup>「國朝縣丞卞化龍命昇尸焚瘞浮屠印白即貢生黃毓祺也。爲築萬骨塋屍骸露積者，皆掩之。」<sup>36</sup>《江上孤忠錄》〈附明史〉則記載此時：

八月二十一日，大清兵從祥符寺後城入，眾猶巷戰，男婦投井皆滿。明遇用皆舉家自焚，(閻)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訓導馮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娣及妻王結衽投井死。里居中書舍人戚勳令妻及子女婦先縊，乃舉火自焚，從死者二十人。<sup>37</sup>

而同年「閏六月十三日突入葑門（蘇州），一時洶洶，焚撫按府長吳五署，巡撫避入瑞光寺，浮屠官兵奮勇殺出」，抗蘿髮魯之嶼（福山副總督，生年不詳-1645）軍潰敗。蘇州城「六門堅閉，城中人死無筭。未幾都督李公至，土國寶必欲屠城。」於是盤門屠殺至飲馬橋，「督撫懸示招安，周荃每左右之，全活城中人無數。」

另，嘉定一地至同年五月十三日「始聞維揚陷，留都不守」的消息。嘉定城內幾股勢力趁機為亂，即同月：

■

<sup>34</sup> 清·韓菼，《江陰城守紀》卷下，《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148 下-149 上。

<sup>35</sup> 清·韓菼，《江陰城守紀》卷下，《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149 上。

<sup>36</sup> 清·黃明曦纂，《江上孤忠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167 上。

<sup>37</sup> 清·黃明曦纂，〈附明史〉，《江上孤忠錄》，《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169 上。

十五日邑諸生群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贐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因亂乘勢劫奪，城中鼎沸。……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頁 23)中搢紳皆出避，百姓結綵於路出城迎之。<sup>38</sup>

李自成部下李成棟率所屬，於豫親王兵下江南時降清，奉命鎮守吳淞。李成棟軍隊所過城鎮，燒殺劫掠、搶取豪奪，同年六月二十六日「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sup>39</sup>二十九日，成棟「悉眾過東門，迤邐以北」，地方當權者「焚倉橋一帶民房。」<sup>40</sup>七月初一日，成棟麾兵入婁塘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一百七十三人。」<sup>41</sup>而困守城內明末將領黃淳耀（生年不詳-1646）聽聞與李成棟內應者傳入「有『開門降，誓不殺人』之語。或言大勢已去，宜為十萬戶生靈計」之榜文，悲慟不已，遂採堅壁清野之策，「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煙焰漲天，累日夜不息」，「視城外曠蕩，鄉兵無一人至者」，「百姓掩泣相視，咸知必死無噍類矣」<sup>42</sup>李成棟至婁東（太倉），「初三日會同婁東兵，盡銳攻城，砲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慄色變，當事者懼。」<sup>43</sup>

嘉定城雖稱完固，仍抵不住清軍日漸集結而兵臨城下的砲火攻擊，「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鉛屑落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至初四五日，李成棟見守城者漸露疲態，攻擊越加急切。而七月嘉定城被攻破，其情據載：

II

<sup>38</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 1，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頁 23-24。

<sup>39</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 1，《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頁 31。

<sup>40</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 1，《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頁 31。

<sup>41</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 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頁 33。

<sup>42</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 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頁 34。

<sup>43</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 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頁 34。

辰刻開門，乃下令屠城。……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勝計。其懸梁者、赴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萬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萬隆鎮浮胷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骨浮於水面全起數分。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亂軍中姓氏不傳矣。……今崑山、嘉定雖被屠，大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搖搖，日聚街頭，聽不根之語，莫敢寧居。<sup>44</sup>

嘉定城破，「城中無主」，又因嘉定與太倉人的衝突再度點燃李成棟屠城的舉動。七月二十六日李成棟率兵長驅進入葛隆鎮，「肆行屠戮，流血沒踝，遂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喬、浦嶂為根絕後患，「力勸成棟再屠嘉定，從之。」<sup>45</sup>此一屠戮，「數十里內，無安居者」，「邑中貧富俱盡」。<sup>46</sup>未久，「遠近始雍髮稱大清順民」。<sup>47</sup>

嘉定屠城，所遭受的迫害，據載：

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搢紳則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孝廉則張錫眉，貢士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侯元演、侯元潔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者不計其數。謂非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哉。<sup>48</sup>

士家大族的離散與眾多百姓的罹難，於上述字裡行間一一被刻畫而出。

大約在嘉定遭逢屠戮的前後時間，即順治二年五月，清兵進入浙地，南渡錢塘江，迫使方國安降清，任總兵，「至婺，圍攻匝月，殺掠

1

<sup>44</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54，頁37-38。

<sup>45</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54，頁39。

<sup>46</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54，頁40。

<sup>47</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54，頁41。

<sup>48</sup> 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東塘日劄》卷2，《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54，頁41。

甚慘」，直到順治二年「閏六月二十五日」。<sup>49</sup>其間，「浙東洶洶，餘杭鄉紳」熊汝霖與孫嘉績密謀舉義抗清。六月十三日清兵至杭，九月十一日杭州城陷，大約此時，載云：

大軍雲集。自起事以來，浙東蜂湧之將，不可勝紀。人盡招兵，人盡派餉，甚且抄掠類聞，搜括殆遍。始猶取投北者括其財，繼則富家大室及農工商賈之人，靡不推索誅求，題官送劄之類，種種惡套，轉相效尤，日甚一日，愈競愈巧，愈出愈奇，而諸營曾無厭足。<sup>50</sup>

清兵入城造成社會秩序的慌亂，而各方士兵趁亂掠奪民財，加重失序狀態。衛匡國目擊此時杭州城的樣子，寫道：

杭州是浙江的首府。城內有很多撤退至此的中國殘兵，既有一般的士兵，也有不少將官及官員，他們決定在此另立新帝，即潞王，出自大明皇族。……他即位不到三天，韃靼軍到來，……韃靼俘虜這個王子，立刻命令居民關閉城門……殘忍屠殺……驅逐和屠殺敵軍後，再凱旋入城，既沒有在城里使用武力，也沒有橫施暴行。那座高尚城市因此得以保全。此城之雄偉、美麗和富庶，我將另加描述，我是眼見為實，不信傳聞。我在該城住了三年。<sup>51</sup>

依照此說，杭州似乎在明清變革之際，沒有受到戰事太大的波及。或許此乃就城市的硬體建設未受重創而言。若就社會失序來說，已如前述。

¶

<sup>49</sup> 明·瞿共美，〈總兵方國安圍金華府〉，《粵游見聞》，《明清史料彙編·二集》，頁2210。

<sup>50</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員會《中國野史集成》冊33，頁324上。

<sup>51</sup> 衛匡國，何高濟譯，《韃靼戰紀》，收入《韃靼征服中國史·韃靼中國史·韃靼戰紀》，頁371-372。

根據張岱(1597-1679)《陶庵夢憶》記載，明末杭州西湖香市，因饑饉、戰亂，致使人潮鼎沸的市集機能走向停滯與衰退。其言：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sup>52</sup>

但是，崇禎 13 年(1640)三月，昭慶寺發生火災，載言：

崇禎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洩饑，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昇出，扛挽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饋送。<sup>53</sup>

自崇禎十三年至十五年，昭慶寺的火災，加上連年飢荒、北虜侵擾，導致香客斷絕、市集停擺。清兵的南下，更重創原已呈現疲態的城市機能。<sup>54</sup>而居住杭城士家大族不因清兵無大肆殺戮便消除面對亡國的恐慌與無助，清兵入城致使杭人自絕於世，或避走他鄉，同樣湧現於史著。順治二年閏六月初五日，山陰祁彪佳「養病里居」，清兵抵浙，祁做絕命詞別宗親，「投於寓園放生池柳樹之陰」。<sup>55</sup>山陰劉宗周則於六月十三

<sup>52</sup> 明・張岱，〈西湖香市〉，《陶庵夢憶》卷 7，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頁 189。

<sup>53</sup> 明・張岱，〈西湖香市〉，《陶庵夢憶》卷 7，頁 189-190。

<sup>54</sup> 陳玉女，〈流浪者之歌：明末遺民・移民的寺廟記憶〉，上海：中國佛學院，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論壇，上海玉佛禪寺合辦，「東亞寺院的社會性功能國際研討會：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界分□ 佛教與東亞宗教寺院的多重社會作用與功能」，2015/08/04。

<sup>55</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0 下-321 上。

日清兵至杭州，「二十三日絕食，二十五日乘舟至，入鳳林，投西洋港，救不死。遂詣辭先墓，暫息靈峰寺。」清招聘，書辭：「大明孤臣某啟，國破君亡，為人臣子，惟有一死。」<sup>56</sup>同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台州紳衿士庶共推擁魯藩至紹興監國，順治三年(1646)元旦，為監國魯元年。<sup>57</sup>張岱也於此時，隨著南明政權移動，從杭州一路避走至蕭山，再到紹興西白山等地。<sup>58</sup>其子張試為定遠將軍陳梧所殺，「盡取金帛妻妾而有之。」<sup>59</sup>

魯監國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兵度江至，監國離紹興。抗清之士，如蕭山翁遜見大勢已去，無奈問向陳潛夫(1610-1646)：

國尚可為乎？南北淪陷，不意外及江東也，皇皇欲何之。我將以錢塘江潮盪我鬱憤也。請先辭去，遂躍入大江死。<sup>60</sup>

諸暨縣庠生湄池傅日炯(生年不詳-1646)，劉宗周弟子，作絕命詞，「投入江中而死。」<sup>61</sup>同鄉儒士傅商霖聞傅日炯死訊，弔以詩，最後「不食而死。」<sup>62</sup>山陰文學范史直，負石投江。陳潛夫兵潰，作絕命詩，「同妻妾孟氏賞月於村之孟家橋，兩夫人先聯臂而入於河，然後先生從焉。」<sup>63</sup>

而浙東金華府則於七月十六日遭受清人屠殺，督師閣部朱大典力戰而死。<sup>64</sup>史載金華「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sup>65</sup>對此，衛匡國寫著：

¶

<sup>56</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1 上。

<sup>57</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5 下。

<sup>58</sup> 明·張岱，〈西湖香市〉，《陶庵夢憶》卷 7，頁 189-190。

<sup>59</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4 上。

<sup>60</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7 下-328 上。

<sup>61</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8 上。

<sup>62</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8 下。

<sup>63</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29 上。

<sup>64</sup>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卷 15，《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14，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頁 88。

金華在圍城戰中使用大炮連續轟擊。後來韃靼人也從省城運來大炮……由此進入城內。他們滿懷仇恨燒殺擄掠。城守（朱大典守金華）在府宅里用一桶火藥炸死自己和全家（參看《南忠記》）……。<sup>66</sup>

綜觀上述，江浙地區因明清鼎革遭受戰亂襲擊，致使無數的士夫大家、廣大的百姓承受諸般不幸，四處逃難，過著骨肉離散的悲苦歲月。如是的動盪，對照圖一所示區域，對於萬曆以來江南地區大力贊助嘉興藏刊刻事業的支援網絡給予莫大的衝擊不言而喻。

### 三、亂世中原護持刻藏士族助刻的賡續與斷裂

江南士紳對紫柏尊者的推崇，延伸對紫柏倡行方冊藏刊刻理念的追崇與奉行者，為數眾多。<sup>67</sup>自稱是紫柏在家弟子的錢謙益，對紫柏達觀極為尊崇，於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1660)的〈紫柏尊者別集序〉說到：

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為萬曆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勿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尊者之文，一言半偈，稱性流出，如水銀撒地，顆顆皆圓，……余雖耄矣，猶願得而見之。歲在庚子，十一月長至後七日，來複之

1

<sup>65</sup> 明·徐芳烈，《浙東紀略》，《中國野史集成》冊 33，頁 330 上。

<sup>66</sup> 衛匡國，何高濟譯，《韃靼戰紀》，收入《韃靼征服中國史·韃靼中國史·韃靼戰紀》，頁 374。

<sup>67</sup> 可參照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場域》，〈第四章 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第五章 江南嘉興藏刊刻各階段的社會資源與願求〉的相關整理與討論，頁 141-265。

日。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錢謙益。焚香肅拜謹序。<sup>68</sup>

錢謙益(1582-1664)對紫柏的高度尊崇，轉而對刻藏一事的投入，不管是撰擬刻藏願文、募疏、或撰文記錄刻藏相關人事，或校讎經疏，或助刻等，無不積極襄助，對嘉興刻藏的重視與關懷甚深。有鑒於此，其《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等相關紀錄，是探索明清鼎革之際嘉興藏刊刻之蛛絲馬跡的重要參考。

觀錢謙益的〈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概述自紫柏達觀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逝世後，近約六十年左右嘉興藏刊刻的人事變化，說道：

大藏之改梵夾爲方冊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開公始也。海內鉅公長者主議，倡導者則有若陸莊簡公光祖、陳莊靖公瓚、東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馮公夢禎。紫柏法眷誓願佽助者，嘗熟繆布衣希雍、金壇于比部玉立，暨丹陽賀氏、吳江周氏、沈氏。刻場初卜清涼，後移雙經，既而恢復化城。訂約化城貯板、楞嚴發經者，中丞用先也。藏師遁跡紫柏示化六十年來物變錯愕而經藏一燈相傳未熄。<sup>69</sup>

錢謙益雖言：「藏師遁跡、紫柏示化六十年來物變錯愕，而經藏一燈相傳未熄。」亦即自萬曆三十一年(1603)紫柏逝世，至順治十七年(1660)，近約六十年間遭遇人事跌宕、明亡清興的「物變錯愕」之大變局，然「經藏一燈」猶未熄。話雖如此，從眾多相關記載來看，刻藏事業自萬曆至順治年間，雖未因各種曲折而停歇，然期間刻藏深受「物變錯愕」之影響，卻確然可見。

¶

<sup>68</sup> 清·錢謙益，〈紫柏尊者別集序〉，《紫柏尊者別集》，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頁 55。

<sup>69</sup> 清·錢謙益，〈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牧齋有學集》卷 4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91，頁 405 上-下。

首先，刻藏事業因紫柏達觀的死獄，以及負責刻藏大任的密藏道開黯然離去而陷入困境，誠如僧永覺元賢(1578-1657)於〈請方冊藏經記〉中所確切指出的，他說：

惜當日任事者，唯法本、道開二師而已。法本早已作古，道開亦以病隱去，老人且以妖書之既(禍)竟至長逝。而刻藏之緣，遂乃中阻。後雖有繼之者，率不得其人。唯賴金壇諸金湯，稍續刻之。然僅及十之六七，又不知完局當在何時也。<sup>70</sup>

此處清楚記載，刻藏事業因紫柏老人的逝世及其所牽動的人事變化，幾使刻藏事業停滯。之後，端賴幾位護法居士，始得以賡續。參照前見錢謙益所述，刻藏初始於紫柏達觀高徒密藏道開，參與倡導的在家居士，有平湖陸光祖（五臺）、常熟陳瓊（雨亭）、太倉管東溟（1536-1608，志道）、嘉禾馮夢禎（1548-1605，志道）；而立願助刻者，有常熟繆希雍(1546-1627)、金壇于玉立（生卒年不詳，中甫）、丹陽賀氏、吳江周氏、沈氏等。

居士的助刻，無疑是刻藏得以持續的關鍵要素。根據臺灣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整理成表一：「嘉興藏歷代各刊本施刻卷數」<sup>71</sup>與表二：「明清之際江南士族施刻卷數案例」，<sup>72</sup>從中可細察嘉興藏各期施刻者施刻的

■

<sup>70</sup> 清·釋永覺撰，清·釋道需重編，〈請方冊藏經記〉，《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15，收入《徑山藏》編委會《徑山藏》冊168，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2016年，頁310上。

<sup>71</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臺北：國家圖書館，2000年，頁1-669。總體合計9434卷與國家圖書館藏本記載9975卷，相差541卷，乃因收錄的題記所載卷數未完全，影響到本文的統計，故表一中的9434卷只能當作參考數字，觀其大略。

<sup>72</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1-669。

狀況及其刊刻的卷數，以窺明末清初政局的動盪下，施刻者投注刻藏心力的起伏變動，及刻藏受時局所限之處。

表一：「嘉興藏歷代各刊本施刻卷數」

	萬曆	天啟	崇禎	明末	南明 (弘光)	清初	順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年代 不詳	合計 (卷)
居士刊本(卷)	3404	367	2021	243		10	223	295			32	6595
僧刊本((卷)	45	28	112	2	1		65	68			11	332
僧俗刊本(卷)	11		48	30		16	34	40			12	191
嘉興楞嚴寺刊本 (卷)	76		289		2	1	262	267				897
徑山寂照庵本 (卷)	40											40
化城寺刊本(卷)	4		4									8
清初刊本(卷)						38	8	3				49
屬性不詳(卷)	58	3	73	8		10	65	341	1	6	757	1322
合計(卷)	3638	398	2547	283	3	75	657	1014	1	6	812	9434

表二：「明清之際江南士族施刻卷數案例」

	萬曆	天啟	崇禎	明末	順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年代 不詳	合計 (卷)
桐城吳用先(卷)	324	7	10							341
丹陽賀氏(卷)	379		172	7	10					568
金壇于氏(卷)	266	104	106		28					504
吳江沈氏(卷)	90		18			22				130
吳江周祗(卷)	80									80
吳江周麟趾(卷)	13	40	5							58
休寧金聲(卷)		1								1
常熟毛晉(鳳苞)(卷)			134	18						152
平湖陸士龍(卷)					15					15
當湖(平湖)馮洪業(卷)				203	13					216
泰和蕭氏(卷)			235		10					245
泰和楊仁惠(卷)			111							111
合計(卷)	1152	152	791	228	76	22				2421

就表一所示，士家大族贊助刊刻之居士刊本（合男女信眾），萬曆至崇禎年間近半世紀，計施刻 6035 卷，若含入清以後之居士刊本，計施刻 6595 卷，約佔九千多卷的三分之二強，泰半刊刻於明亡之前，入清之後明顯大幅降低。若對照表二所揭載江南幾位士紳家族於明末清初施刻卷數的起伏狀況，則得見萬曆期間，始終熱心助刻的士紳家族，進入明末崇禎，或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有的逐漸退場，不復見其施刻身影。繼之，雖有新施刻的家族出現，但集資合刻的情形及嘉興楞嚴寺刊本遠較萬曆時期大量增加。這意味著時局變動對原有的刻藏支持體系產生衝擊。

然具體狀況為何，以下將根據表二中的幾個士人家族助刻案例，觀察其於明清鼎革之際個人或家族的遭遇，對嘉興藏刊刻所造成的具體影響。而這些家族的選取，含括士人本身及其家族直接或間接表達對紫柏達觀的尊從，進而贊助嘉興藏刊刻者，尤其自萬曆年間刻藏始，至明末，乃至清初等長時期持續助刻士族；其次涉及這些士人家族多半與明末清初關注嘉興藏刊刻進程極為突出的錢謙益保有友朋關係者。希望借助錢謙益的相關文獻記載，以及透過土人與紫柏達觀、士人與士人、士人與錢謙益等多層的師友、親友及友朋關係的解析，以窺明末清初世變之際嘉興藏刊刻支援網絡鏈結與斷裂的大致輪廓。

### （一）吳用先家族

根據表二顯示，桐城吳用先，施刻時間集中在萬曆年間，天啟、崇禎年間只見其零星施刻。明亡之後，未見有施刻之記載。吳用先即是前揭錢謙益所述：「紫柏法眷誓願佽助者」，有「訂約化城貯板、楞嚴發經者」的「中丞用先也」。其「號本如，桐城人。恢復下院化城，歲施刻

藏銀一百兩。」<sup>73</sup>

吳用先於刻藏伊始，即是支持紫柏達觀刻藏的重要在家護持者。其於〈題重興化城接待寺疏〉中，自稱：「余從紫柏尊者游逾二十載」，接受諸般的搥杵磨練，最後達觀「以流通佛法付囑」，即刻藏大務。是故，吳用先「悉心殫力，求刻藏之役」，當刻場由五臺山移至徑山時，更致力於「謀藏板善地，卜及化城。」<sup>74</sup>《徑山志序》言：

達觀禪師昔謀刻大藏，易以書冊，廣為流通。澹居鑑公承之，與吳本如諸公，恢復化城寺貯此刻板，事甫就而入滅，任此志者遂虛無人矣！<sup>75</sup>

吳用先於萬曆年間對刻藏的傾心投注，其情其景由此可知一二。

《桐城舊耆傳》載：「司馬吳公，諱用先，字體中，一字本如，號餘菴。」天啓二年(1622)被任命為薊遼總督，不久，「會璫禍起，致政歸，卒於家。崇禎初，特賜贈廕祭葬。」<sup>76</sup>據此得知，吳用先當逝世於崇禎初年，但哪一年未能確知，對照《成唯識論俗詮》卷 1-3 牌記：「皖城浮渡居士吳用先捐俸奉刻」，<sup>77</sup>施刻年代僅見〈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記載為「明崇禎間皖城吳用先刊本」。依此，只能推估吳用先當

■

<sup>73</sup> 明・宋奎光，〈外護・吳用先傳〉，《徑山志》卷 11，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992。

<sup>74</sup> 明・吳用先，〈題重興化城接待寺疏〉，明・宋奎光《徑山志》卷 4，《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頁 410。

<sup>75</sup> 明・黃汝亨，〈徑山志序〉，明・宋奎光《徑山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頁 36-37。

<sup>76</sup> 清・馬其昶，〈吳司馬廷尉傳第三十六〉，《桐城舊耆傳》卷 4，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頁 185-187。

<sup>77</sup> 明・釋明星，《成唯識論俗詮》卷 1-3，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1，頁 27 中、42 中、55 下。

逝世於崇禎年間施刻《成唯識論俗詮》之後。

吳用先去世後，乏後人承繼其志，協助「刻藏」事業。亦即吳用先施刻之舉，隨其逝世而終止。根據同傳所載，吳家後代深受明末「璫禍」及「鼎革」之害，明亡後，有流寓他鄉，甚遭橫禍者。吳用先之子吳日暉，「官廢生，鼎革後，以枕藏唐王三詔，為家奴所首，被執，死於市。」另一子吳日昶，字函三，「廢中書舍人，以璫禍起，告歸。性至孝，雖流寓，每歲必一歸，省先墓。」<sup>78</sup>按吳用先生前對刻藏的積極推動與贊助，其後人的遭遇，無疑帶給刻藏不小的衝擊。因此，入清之後不再有施刻之餘力，可想而知。

## （二）周安期家族

蘇州西山一帶是明清之際士人避難、交會之所，據〈重刊鄧尉聖恩寺志序〉稱蘇州西山是明末清初士僧隱遁之所。載云：

鄧尉於吳郡西山中為最勝，而聖恩寺位其南麓，……而為選佛之場，安禪證法之勝地也。嘉魚於崇禎初作宰吳江，徵入為給事中。明亡，棄儒冠隱匿廬南嶽間，後來靈巖頂禮弘儲，得承印記，為三峰漢月再傳弟子，世所稱黃蘖禪師者也。方嘉魚染翰之年，正值贍部毘嵐之劫，修羅下降剝幢摧倒，而江南半壁歌舞湖山，鈎黨重興，清流竄逐，積悴之士如蒼雪、咒林、月函、大瓢諸老遂以吳山為棲遁之所。獨鄧尉弘璧少不涉世網，以正覺闡大法，而與諸大德相投契。卽文文肅、姚文毅、劉大參、蔡忠襄輩亦皆推挹宗風，相與為世外之友。<sup>79</sup>

清楚得見，位於蘇州西山一處，即是吳山一地，是明末清初僧俗士人隱

<sup>78</sup> 清·馬其昶，〈吳司馬廷尉傳弟三十六〉，《桐城舊耆傳》卷4，頁187。

<sup>79</sup> 清·金天羽，〈重刊鄧尉聖恩寺志序〉，《鄧尉山聖恩寺志》，收入《中國佛寺志叢刊》冊44，頁1-2。

遁棲息避難與交流要地。而錢謙益所稱：「紫柏法眷誓願佽助者」，有吳江周氏，即吳江周季華，其子周安期與明末清初蘇州這一帶的隱遁之士亦互有往來。位居吳郡西山的鄧尉聖恩寺，據該寺志序云：「寺故有志，吾邑鄉先生周安期永年所纂輯，而嘉魚熊開元所裁定。」吳江周安期，名永年，與熊開元、錢謙益為友。錢謙益(1582-1664)的〈周安期墓誌銘〉寫道，周安期「家世奉佛」，「稟承父叔刻藏飯僧，誓終紫柏付囑，窮老盡氣若營其私，蓋能以儒脩梵行稱其家風者也。」<sup>80</sup>

周安期父親周季華，「長師事達觀可公」，<sup>81</sup>與同鄉周叔宗為紫柏「高足弟子」，<sup>82</sup>其「復古剎，刻《大藏》，立齋飯僧，皆竭靡以從事。」<sup>83</sup>在密藏道開之〈刻藏大願文〉中，提到：

手卷存之徑山，另錄此箋留吳江周季華居士處，俟藏事告成附刻藏緣起後，願力深廣，定有繼起肩荷者，無慮其不克終也。道開謹書為左券，本師和尚同開之、仲淳兩居士證明。<sup>84</sup>

按上文，密藏道開之刻藏願文手稿保存於徑山，另贍錄一冊交由周季華保存。周季華於五臺山刻藏時期，被委以收訖刻藏捐資後，檢送至五臺山之責，即僧密藏致〈與吳江周仲大沈及菴吳孚泉三居士〉信函中所提：

II

<sup>80</sup> 清·錢謙益，〈周安期墓誌銘〉，《牧齋有學集》卷 3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307 上-下。

<sup>81</sup> 清·錢謙益，〈周府君墓志銘〉，《牧齋初學集》卷 54，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641 下。

<sup>82</sup> 清·錢謙益，〈空一齋詩序〉，《牧齋有學集》卷 20，《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188 下。

<sup>83</sup> 清·錢謙益，〈周府君墓志銘〉，《牧齋初學集》卷 5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641 下。

<sup>84</sup> 鏡花頭陀中衍記錄，〈刻藏大願文〉，明·釋道開《密藏開禪師遺稿》上卷，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頁 3 上。

江城檀貲想已雲集，乞付認卿、季華，檢發來山。自後每歲所供惟在三大士，不違時失，候收，付認卿、季華兩居士，以候山中人遲蚤詣彼索之，山中遣役或遲或蚤，蓋無定期也。<sup>85</sup>

錢謙益，〈紫柏尊者別集序〉同樣指出周季華等人為紫柏達觀在家執侍弟子。其言：

金壇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啟忠集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按指禪師攜吳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周季華、周子介，執侍左右。手自繕寫者，余為會萃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為四卷，名為紫柏別集。<sup>86</sup>

周季華尊崇紫柏達觀，並熱切護持刻藏志業，為其子周安期所賡續，曾施貲助刻《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卷三十七之二，載有「周安期、陸嗣哲、劉德嚴、王孟和、慧鏡，以上五名共助銀一兩三錢」。<sup>87</sup> 然遭逢明清鼎革戰亂，「亂後移家西山」，此為前述僧俗之士紛紛避難隱遁之所。移入西山之周安期，據錢謙益形容，「與余執手噓噦，酒半脫帽，垂頂童然，狀顧影長歎，以謂老可踐而死可貰也。」<sup>88</sup>而遭此難處的周家，要能如往昔般投注心力或財力於刻藏，恐非易事。<sup>89</sup>

■

<sup>85</sup> 明·釋道開，〈與吳江周仲大沈及菴吳孚泉三居士〉，《密藏開禪師遺稿》上卷，《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頁 15 下。

<sup>86</sup> 明·錢謙益，〈紫柏尊者別集序〉，《紫柏尊者別集》，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頁 55。

<sup>87</sup> 唐·澄觀撰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12，頁 239。

<sup>88</sup> 清·錢謙益，〈周安期墓誌銘〉，《牧齋有學集》卷 31，《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307 下。

<sup>89</sup> 明·釋道開，〈刻藏大願文〉，《密藏開禪師遺稿》上卷，《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頁 3 上。

### (三) 葉紹袁家族

同是出身吳江望族的葉紹袁(1589-1648)，是周安期友人，與其互有往來。同樣依從紫柏達觀尊者，曾贊助刻藏。根據葉紹袁自撰年譜紀載，崇禎九年(1636)六月，同吳茂申、周安期、沈君善、沈君服前往徑山，「捫蘿陟崖撫弔碑，慨然典型不遠之思，寂照庵則大師藏經處也。」<sup>90</sup>（參照圖二、圖三）<sup>91</sup>此處所稱大師，是指紫柏達觀。葉紹袁於崇禎十一年(1638)十一月上灘日，自述：

夢紫柏尊者過余，余亟迎入秦齋。師南面憑几坐，余拜几下。師為書二語，遂寤，忘其上句。<sup>92</sup>

紫柏出現於葉紹袁夢境之中，顯示葉紹袁對紫柏的擁戴與愛敬。其與友朋一同上徑山寂照庵憑弔紫柏行誼，同周安期家族一般尊奉紫柏之法義與佛教志業。

<sup>90</sup> 明·葉紹袁，《葉天廖年譜》，崇禎九年六月記載，收入《嘉業堂叢書》冊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38。

<sup>91</sup> 作者於 2017/07/15-7/25，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移地研究，承蒙杭州徑山寺及法幢法師的協助，始得順利考察徑山（嘉興）藏刊刻之相關遺址，於此特申致謝之意。

<sup>92</sup> 明·葉紹袁，《葉天廖年譜續》，崇禎十一年(1638)十一月上灘日記載，收入《嘉業堂叢書》冊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3。



圖二：杭州徑山寂照庵嘉興刻藏遺址  
(作者攝于 2017/07/20)



圖三：明紫柏達觀塔遺址  
(作者攝于 2017/07/20)

葉紹袁接續談到：

未幾，為四子世侗入郡學，從郡返，至江干。適余初度日，諸友醵金壽余，余不敢虛諸友意，共二十金，受之，佐刻藏經。因過接待招提寺，主希白為展師遺照，幸一瞻禮，恍如夢境。<sup>93</sup>

葉紹袁將友人為其作壽所籌湊餽贈的二十金，轉而作為贊助嘉興藏經刊刻之用，以表達對紫柏達觀倡行刻藏的護持。

明亡後，葉紹袁家族過著離散的流亡生活。於順治二年(1645)，即「乙酉八月，見吳日生、沈君晦二師悉潰，遂盡率其子披剃入浙，號曰桐華流衲，又號木拂。」<sup>94</sup>此即《甲行日注》記載，值弘光元年(1645)

¶

<sup>93</sup> 明・葉紹袁，《葉天蓼年譜續》，崇禎十一年(1638)十一月上澣日記載，《嘉業堂叢書》冊 1，頁 3-4。

<sup>94</sup> 清・陳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292。

八月二日，清兵南下，吳日生、沉君晦二軍潰散，葉紹袁眼見逢迎清軍之士大夫行徑，深感不齒，矢志「游方外以遁，時八月二十四日也。」次早二十五日拜別家廟，同其子世佺（雲期）、世侗（開期）、世倌（星期）、世倕（弓期）前往圓通庵，將三個年幼孫子藏匿他所，圓通庵主達元收留他們父子，告以「且再觀去就」。<sup>95</sup>而二十六日晚，葉紹袁外甥仲日（名祇敬），欲隨葉紹袁一同出家。二十七日葉紹袁家人至圓通庵與其拜別，葉紹袁告之：「此行也，若幸中興有期，則歸來相見亦有日，不然從此永訣矣。」<sup>96</sup>同時安排家中婦女，「可寄西方尼庵，汝輩但為謀其糊口者，俾無凍餒以死。」隨後，葉紹袁等前往棲真寺香上人簡庵，當夜由可安上人為其剃度出家。<sup>97</sup>出家非其本願，故感嘆：「此後或有黃冠故鄉之思，但恐彭澤田園，門非五柳，遼東歸鶴，華表無依耳。」<sup>98</sup>反映出家族離散的無奈與茫然不安的心情。

葉紹袁家族，遭此巨變，家人分散寄食於各處佛庵，暫取溫飽。葉家財力告匱，八月二十九日記載：「自七月中滯廩人告匱，借一從昆米十石食指率然，又復告罄。茲行攜圓通庵米一石，錢二千文。」其米、錢來自圓通庵的接濟，感嘆：「傷哉，貧也。」<sup>99</sup>葉紹袁等人一寺接著一庵，一庵接著一廟堂，不斷遷徙流轉。<sup>100</sup>過程中曾覺察濟助他的「德謙逐客意已甚久也。」慨嘆：

<sup>95</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1，收入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2925。

<sup>96</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1，《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頁2927。

<sup>97</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1，《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頁2928。

<sup>98</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1，《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頁2928-2929。

<sup>99</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1，《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頁2929。

<sup>100</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1，順治二年十月初七日，《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頁2943。

余自至安廬，兩兒病皆幾死，又死一僮，無多囊橐，盡耗醫藥。間此行又無半錢粒米寄至，毋論久留，取主人厭，實亦不能枵腹存也。次日即為整裝計矣。<sup>101</sup>

葉紹袁雖削髮出家行腳各地，但流落在寺庵廟宇之間，過著捉襟見肘的日子，不禁令人傷感。面臨此苦難的葉家，對捐助刻藏一事，縱使有心，已無餘力。

#### （四）丹陽賀氏家族

丹陽賀氏及金壇于氏，則是傾家族之力助刻藏經之士。憨山德清(1546-1623)的〈紫柏老人集序〉述及：「師（紫柏）初往來于金沙（金壇）曲阿（丹陽）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sup>102</sup>；〈達觀大師塔銘〉：「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sup>103</sup>誠如憨山德清口述，當紫柏達觀倡議刻藏嘉興，時「吳江沈周二氏、曲阿賀孫、金沙于王諸氏，聚族歸禮。」<sup>104</sup>賀氏、于氏、王氏等聚族皈依紫柏達觀，王氏乃指金壇王肯堂(？-1638)家族。相關文獻顯示，家族間彼此交好、關係密切。王肯堂施刻多在萬曆年間，至於崇禎十三、四年(1640-1641)有「金壇縣王門于氏法名深吉施貲刻」《大般涅槃經疏》卷 14-33 的紀載，<sup>105</sup>王門于氏應是王肯堂等大家族中之女眷，但為王肯堂之何人，

■

<sup>101</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 1，順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明清史料彙編》第 3 集，頁 2956。

<sup>102</sup> 明・釋德清，〈紫柏老人集序〉，《紫柏尊者全集》卷首，收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冊 73，台北：白馬精舍印經會，出版年不詳，頁 135 上。

<sup>103</sup> 明・釋德清，〈達觀大師塔銘〉，《紫柏尊者全集》卷首，《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冊 73，頁 140 下。

<sup>104</sup> 明・釋德清，《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卷下，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頁 816 上。

<sup>105</sup> 參見《大般涅槃經疏》卷 14-33，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頁 128、132、136、140、145、150、155、159、164、169、173、177、182、187、192、196、

不得而知。而賀、于二氏助刻卷數甚眾，助刻之行直到清初順治年間，然入清之後亦極度下滑。

首先，就丹陽賀氏家族的助刻予以探討。根據《護法錄》卷七之牌記：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娘、賀炌、賀焜施貲共刻《護法錄》第七卷，計字九千零三百五十五箇，該銀四兩六錢七分八厘。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進賢陳叔道刻。天啟辛酉元年春四月徑山化城識。<sup>106</sup>

再從各刻經場之施刻者察看，屢見江蘇丹陽賀學易、賀學仁、賀學禮、賀學古、兄弟及其子輩賀懋熙、懋美、懋廉、懋謙、懋讓、普燈、賀門周氏、楊氏、華氏，男懋元、懋光，女愛官、荊光祖母賀氏、室姜氏等賀氏家族之善男信女大力捐助刻藏之舉。<sup>107</sup>

錢謙益所稱「丹陽賀氏」，乃指賀學仁、賀學易、賀學禮等賀氏兄弟。錢謙益尤與賀學仁家人親近，而賀娘、賀炌、賀焜三人乃賀學仁之子。按《徑山志》，〈外護·賀娘傳〉載：「以父中書公虛谷皈依紫柏，歲輸刻藏銀若干。」<sup>108</sup>文中賀中書虛谷，即錢謙益，〈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后〉一文所稱：「故征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丹陽賀公」的賀學仁，賀娘即是錢謙益摯友賀世壽，是賀學仁之子。<sup>109</sup>錢氏稱賀學仁逝世後十

200、206、210、215。

<sup>106</sup> 明·宋濂，《護法錄》，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1，頁 668 下。

<sup>107</sup> 陳玉女，〈第四章 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場域》，頁 179；同書〈第五章 江南嘉興藏刊刻各階段的社會資源與願求〉，頁 245-246、頁 251。

<sup>108</sup> 明·宋奎光，〈外護·賀娘傳〉，《徑山志》卷 11，《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頁 994。

<sup>109</sup> 清·顧炎武，〈皇太子名不諱〉記載：「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娘，以避

九年，即「崇禎壬午，公以子世壽貴，得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sup>110</sup>依此推估，賀學仁應去世於天啟三年(1623)前後。錢謙益自稱：「余與世壽，兩榜皆同舉，得以契家子事公」。然賀學仁卻以兄弟情誼視之，即錢謙益稱賀學仁：

公與嘗州沈伯和、長興丁長孺、金壇于中甫、吾里繆仲醇為友，以節槩意氣相期許。余晚出，亦參與焉。公遂以弟畜余，不以年家輩行也。<sup>111</sup>

據此得見，賀學仁與施刻藏經之江南人士平日交往的人脈關係，由此累積紫柏達觀刻藏大業的重要基礎。

而金壇于中甫(玉立)與丁長孺(元薦)，則是「時人以為黨魁」。<sup>112</sup>據《明史》，〈丁長孺傳〉、〈于玉立傳〉，兩人均與東林人士往來，是東林黨人，對於朝政、時局之弊直言極諫，裸露攻訐其惡，引發對立人士的反擊。<sup>113</sup>〈于玉立傳〉載：

皇太子名，改名世壽」，《日知錄》卷 23，收入《清代學術筆記叢刊 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頁 366 下-367 上。

<sup>110</sup> 清·錢謙益，〈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后〉，《牧齋初學集》卷 8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213a；清·宋犖，〈漫堂續墨品〉：「丹陽賀氏墨名最著，萬曆朝有名學仁者，字知忍，官中翰，以子世壽貴，贈宮保。司農與兄孝廉、學禮皆有墨癖，所製以鬚珠為最佳，松潤雲香次之，今絕不可得」，《西陂類稿》卷 27，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35，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頁 313 下。

<sup>111</sup> 清·錢謙益，〈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后〉，《牧齋初學集》卷 8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213 上。

<sup>112</sup> 清·錢謙益，〈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后〉，《牧齋初學集》卷 8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213 上。

<sup>113</sup> 清·張廷玉，〈丁長孺傳〉與〈于玉立傳〉，《明史》卷 236，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6156-6158。

玉立倜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為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sup>114</sup>

萬曆三十一年(1603)立儲之爭所牽扯的「妖書事件」，牽連與于玉立關係密切的紫柏達觀被羅織入獄，此與于玉立等人的朝野黨派衝突極為相關。<sup>115</sup>而賀學仁與丁長孺（元薦）、于玉立等人密切交遊，「周旋患難，不少引避」。其子賀世壽「以鉤黨被錮」，賀學仁告訴錢謙益：「吾喜吾兒之得與黨人也，吾又喜兄之碩果不食也。」<sup>116</sup>前揭所見，賀世壽於崇禎十五年(1642)，「得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明亡後，即崇禎十七年五月明遺臣擁福王於南京為監國，賀世壽任刑部侍郎，同年八月任督倉尚書。乙酉為弘光元年(1645)，三月十九日崇禎忌日，設壇於太平門外，阮大鋮哭喊：「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日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sup>117</sup>

南明政權仍瀰漫著自明末以來黨派間伐異黨同的意氣之爭，而身為東林黨人的賀世壽，不久後，告病乞歸，「大鋮密遣人劫之江中」。<sup>118</sup>賀世壽施刻藏經則止於崇禎年間，<sup>119</sup>其兄弟賀焜為「祈雙親冥福，得悟佛，

■

<sup>114</sup> 清·張廷玉，〈于玉立傳〉，《明史》，卷 236，頁 6158。

<sup>115</sup> 于玉立、沈令譽與紫柏達觀於萬曆三十一年「妖書事件」中的牽連，詳細可參照陳玉女，〈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兼論佛、道兩勢力的對峙〉，「妖書事件與紫柏達觀之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3，1997 年，頁 234-242。

<sup>116</sup> 清·錢謙益，〈書鄒忠介公賀府君墓碑后〉，《牧齋初學集》卷 8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213 上。

<sup>117</sup> 清·南沙三餘氏，〈安宗皇帝紀〉，《南明野史》卷上，收入《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頁 85。

<sup>118</sup> 清·南沙三餘氏，〈安宗皇帝紀〉，《南明野史》卷 1，《明清史料彙編》，頁 86；清·李瑤，〈阮大鋮傳〉，《繹史摭遺》卷 18，收入《明代傳記叢刊》冊 105，臺北：明文，1991 年，頁 290。

<sup>119</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

承一切有情，共證菩提」，分別於崇禎元年(1628)、七年(1634)施刻《註心賦》卷 1-4。<sup>120</sup>進入南明之後，政局紛擾，便未見賀娘兄弟再有施刻之舉。

事實上，丹陽賀氏家族施刻卷數較多者，乃屬賀學禮父子這一房。崇禎年間賀氏家族施刻 172 卷中，「賀懋熙、懋照、懋熒、懋燾、懋煥，仰承先嚴賀學禮」施貲刻經之遺願，<sup>121</sup>計施刻高達 162 卷，是明末賀氏家族中施刻方冊藏的主力。而賀懋熙等繼承父志大力助刻經藏之外，〈熒盛光如來陀羅尼經跋〉更載明其施刻的進一步緣由，說道：

佛弟子賀懋熙，受氣孱弱，而為宗子。顧惟壽命不長，無遑盡奉養之勤。以是發心刻熒盛光王佛、出相吉祥陀羅尼經，壽諸天下，凡有如懋熙之願者，因經得咒，因咒得益。譬一燈光，傳百千億；百千億光，傳之無盡。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恒為熒盛光王如來之眷屬，以弘法為家務。更願凡因此經得益者，滿願如熙等無有異。<sup>122</sup>

賀懋熙因身體羸弱而施刻《熒盛光如來陀羅尼經》，誓願生生世世作為佛門法眷，「以弘法為家務」。此願正體現了賀懋熙何以始終積極施刻佛經之行。

然入清後，順治年間縱行施刻，但卷數有限。而賀懋讓之子賀丕業（全業），「丹陽諸生。崇禎末，隨父懋讓之任上林。永歷在藩邸，受教

■

初稿・子部》冊 4，頁 57。

<sup>120</sup> 宋・釋延壽，《註心賦》卷 1-4 之各卷牌記，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0，頁 337、346、353、360。

<sup>121</sup> 例如參照《禪宗正脈》卷 1-7，卷 9-20 之施刻題記，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0，頁 9、17、26、34、42、47、54、71、75、84、91、99。

<sup>122</sup> 明・釋真可，〈熒盛光如來陀羅尼經跋〉，《紫柏尊者別集》卷 1，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0，頁 59b。

講讀。」任南明永曆朝官，後因上疏「慨陳四維三綱、人心朝廷一疏，言詞激切，傳誦當時，共推中興第一疏。」卻因此得罪把持朝政的彭年與陳邦傅等，後為彭年反噬，於永曆二年(1648)被逮入獄，為夏國祥所營救，出獄後「不知所之」。<sup>123</sup>如此，明清變革之際，丹陽賀氏家族，多奉南明正朔，顯示不與清政權妥協的態度，既影響其家族勢力的發展，對於刻藏所能付出的心力亦隨之下滑。

### (五) 金壇于氏家族

金壇于氏家族，乃指于玉立、于玉德兄弟。自萬曆刻藏開始至明末清初，同丹陽賀氏家族一樣，積極助刻。于玉立施刻集中在萬曆時期，逝世於天啟初年。而天啟、崇禎年間，于氏家族的施刻主要由於玉德贊助，譬如「金壇居士于玉德為亡父見素府君、母虞太安人」，崇禎十三年(1640)施資刻《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卷 19-23、卷 25-39，<sup>124</sup>崇禎十四年(1641)，施資刻《法華經安樂行義》卷 5、《涅槃經玄義發源機要》卷 1-4。<sup>125</sup>

入清後，順治二年即弘光元年(1645)于玉立後人于元凱、于元顥同「為亦庵府君資冥福」，分別施刻《大乘入楞伽經》7卷、《月燈三昧經》11卷。<sup>126</sup>據于元凱，〈密藏禪師遺稿序〉言：「予生平未嘗究心內典，而

■

<sup>123</sup> 清·計六奇，〈賀全業出獄〉，《明季南略》卷 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324。

<sup>124</sup> 參見明·太宗，《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6，頁 78、83、88、93、98、110、116、120、126、132、137、143、149、155、160、167、172、178、184、190、195。

<sup>125</sup> 參見(北魏)釋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卷 5，及宋·釋智圓，《涅槃經玄義發源機要》卷 1-4，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頁 233、240、246、252、257。

<sup>126</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 4，頁 59、64。

先君遊於紫柏尊者之門，以密藏禪師為畏友。」此處所言先君，似乎是指于玉立。因同序言：

師(密藏)立志刻書板大藏流傳於世，而尊者與馮太史輩已有同心。萬曆丙戌，師弟同入京師，慈聖皇太后知有刻藏之舉，欲發帑金命刻。尊者謂宜令率土沾恩，師願以一身任事，遂撰文廣募，隨立規條。<sup>127</sup>

萬曆十四年(1586)，「師弟」即密藏法師和于玉立二人「同入京師」。隨後，于玉立於萬曆十五年(1587)正月望日立〈刻大藏願文〉，自述：「既壯，獲承事達觀老師稱弟子，始歸成法道。十方三世佛事願一肩荷之摩頂至踵致之法王。」又言萬曆十一年及第任官以來，惶恐毫無建樹、有愧國恩，巧「會吾法兄密藏募刻大藏，遂發願捐每歲俸貲為唱緣，即去官亦捐資如俸，以終始其事。」<sup>128</sup>

至此了解，于元凱、于元顥應該是于玉立之後，因上述情節符合于玉立的經歷。故于元凱兄弟刻藏之舉實乃承父志，與刻藏人士仍互通往來。至於于元凱撰寫〈密藏禪師遺稿序〉的時間無確切註明，若按同為遺稿寫序的覺浪道盛(1592-1659)與止庵居士王祺(生卒不詳)均題撰於「戊戌秋日」，及釋道盛，〈密藏開禪師遺編序〉言：「今六十年後，有腳下兒孫如按指者搜出此卷編」來看，<sup>129</sup>「戊戌秋日」，應是順治十五年、南明永曆十二年(1658)的秋天。故于元凱的〈密藏禪師遺稿序〉亦當完成於此時。但此後便未見于元凱與刻藏相關的消息。就于玉立與紫

## I

<sup>127</sup> 清·于元凱，〈密藏禪師遺稿序〉，明·釋道開《密藏禪師遺稿》，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冊 15，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頁 2 上。

<sup>128</sup> 明·于玉立，〈刻大藏願文〉，明·釋道開《密藏禪師遺稿》，《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冊 15，頁 4 下。

<sup>129</sup> 清·道盛，〈密藏開禪師遺編序〉，明·釋道開《密藏禪師遺稿》，《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冊 15，頁 1 中。

柏、道開和方冊藏刊刻的緊密關係，立願之深為于元凱所深知，不過于家確實於明清鼎革後的清初投入施刻卷數顯得極為有限。

若進一步對照相關史料，如《民國重修金壇縣志》所載于玉立：

子鑒之，字昭遠，與弟鑑俱聰穎，為文深思汲古，不苟作，錢謙益極愛其才。困場屋不得志，偶作雜感。詩云：萬事只如芳草暮，一生常比落花時。是年遂卒。士人惋惜之。<sup>130</sup>

據此，于玉立兒子于鑒之、于鑑兄弟是否為于元凱、于元顥二人又將啟人疑竇，同傳沒有更多相關的敘述，其間關係甚難判斷。但于鑒之好文才，為錢謙益所賞識。此等才能及其與錢氏之關係，與于元凱受邀撰寫〈密藏禪師遺稿序〉的情形有幾許相符之處。只是于鑒之是否即是于元凱，亦難就此斷定。前揭《金壇縣志》載有〈于元凱傳〉，所述與前見于元凱、于鑒之的經歷不同，但順治十八年「海通案」以後，于元凱「不知所終」的境遇，卻可與前述金壇于氏家族於順治十五年秋天之後，未再看到與刻藏有關的任何消息作一合理的聯想。

〈于元凱傳〉載：「字賓之，貲財雄一邑，好施與善，騎射勇力絕人。」<sup>131</sup>于元凱是金壇富紳，但順治年間發生著名的清初三大案，為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十一年(1661)的海通案、哭廟案和江南奏銷案，被牽連入獄處刑的江南士家大族，為數眾多，嚴重打擊江南仕紳階層。于元凱則因事涉海通案，致使事後「不知所終」。

《金壇縣志》記載：「國初海寇一案，官紳士民駢戮者六十餘人，

<sup>130</sup> 馮煦纂修，〈于玉立〉，《民國重修金壇縣志》卷 9 之 4，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據民國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影印，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頁 159 上。

<sup>131</sup> 馮煦纂修，〈于玉立〉，《民國重修金壇縣志》卷 9 之 4，《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頁 220 上。

配沒者六十餘家。」時有明文選司郎中王重及國朝賓州道袁大受退官歸里，「互相朋比肆虐」鄉閭，為人所痛恨。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破郡城，人情洶洶訛言，欲逐貪官，鋤豪紳，斃其人，而焚其廬。」袁大受亦難逃受人撻伐之罪。當時「貪黷性成」的金壇知縣任體坤（生卒年不詳），史載：

會成功遣使徇屬邑，任不知所出，會諸紳於明倫堂，議遣諸生虞巽吉等八人，赴郡納降為緩兵計，寇遂不至。而令以虧帑，故不自安，遂以納降之罪謫於士民，密揭於撫臣而遁之溧陽。撫臣得揭，駭以為一邑盡叛，欲發兵屠金壇，賴海防同知陶鼎鉉力爭得寢。<sup>132</sup>

但袁大受卻想藉此「泄怨」，迎回任體坤，「而悉委其罪於士民」。前後兩次上疏控訴「諸生及素所不快者三十八人以上，又別控于元凱於督撫」。<sup>133</sup>〈于元凱傳〉載：

及國初海案作，邑紳讐賓之者，稱賓之通逆為（偽）隆武大將軍，控之於督撫憲，檄到縣令任體坤飭役捕之。賓之已預知，乘騎西去，衆役憚其勇，不敢逼，得脫入都投龔鼎滋。<sup>134</sup>

亦即袁大受誣指于元凱（賓之）與鄭成功暗通款曲，企圖謀逆。元凱早知禍將臨頭，遂逃入北京投靠刑部尙書龔鼎滋。龔鼎滋妻顧妹，原是「金陵名妓」，「色藝冠一時」，「賓之為脫籍，置華屋貯之。」故鼎滋為圖報元凱之恩，遂向孝莊太后稟陳原委。最後「特旨赦免」于元凱，「二子

## I

<sup>132</sup> 馮煦纂修，〈海通一案〉，《民國重修金壇縣志》卷 9 之 4，《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頁 220 下-221 上。

<sup>133</sup> 馮煦纂修，〈海通一案〉，《民國重修金壇縣志》卷 9 之 4，《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頁 221 上。

<sup>134</sup> 馮煦纂修，〈于元凱傳〉，《民國重修金壇縣志》卷 9 之 4，《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頁 220 下。

繫省獄，亦因得釋，賓之遂不知所終。」<sup>135</sup>

《金壇獄案》稱：金壇一邑，因「海寇一案，屠戮滅門、流徙遣戍，不止千餘人」。<sup>136</sup>牽扯之大，可想而知。《研堂見聞雜記》載順治十六年（1659）：

己亥，海師至京口，金壇諸搢紳有陰為款者。事既定，同袍相訐發，遂羅織紳衿數十人。撫臣請於朝，赤同發勘臣就訊。……又昔年所獲大成、圓果諸教，至是獄定，亦磔於江寧，所謂江南十案者也。共得數百人，同於辛丑七月，決於江寧市，血流成河，無不酸鼻。<sup>137</sup>

又：

吳下錢糧一案，練川之獄得千餘人。……其前就緝一百七十人，以恩赦免提；餘俱革去衣頂，照例處分。乃撫臣更立奏銷法，歲終，將紳衿所欠造冊申朝。……蘇、松、常、鎮四郡並溧陽一縣，紳士共得三千七百人。……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吳寧周、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佑、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sup>138</sup>

孟森指出發生於順治十八年江南奏銷案，「蘇、松、常、鎮四屬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全案一萬三千餘人，其

<sup>135</sup> 馮煦纂修，〈于元凱傳〉，《民國重修金壇縣志》卷 9 之 4，《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頁 220 下。

<sup>136</sup> 清·計六奇，《金壇獄案》，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 27 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719 上。

<sup>137</sup> 清·不著撰人，《研堂見聞雜記》，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5 輯，臺北：臺灣大通，1987 年，頁 52。

<sup>138</sup> 清·不著撰人，《研堂見聞雜記》，《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5 輯，頁 52。

中涉及名人者當更不少」。<sup>139</sup>江南富紳名士無端捲入清初三大案，因之罹難或遭受捶杖、家族離散、不知所終者，比比皆是。清初政府借此剷除江南仕紳長期盤固地方的勢力，是鞏固其政權的重要手段。<sup>140</sup>職是，江南嘉興方冊藏的刊刻亦不能置身於上述事件波及之外，諸多士族大家的施刻進入清初順治年間明顯趨緩，與江南士家大族遭受整肅、家族的離散及社會秩序的崩解莫不相干。

#### 四、世變中繼起助刻之士人家族

明末清初施刻家族，縱有自萬曆刻藏開始，贊助至順治年間，如丹陽賀氏、金壇于氏，但這樣的家族，自上述討論及表二：「明清之際江南士族施刻卷數案例」所示，終究為數不多。世事變化、家族興衰都是重要左右因素，鼎革前後的「物變錯愕」更無法迴避它對人事物的重大影響。表二顯示自天啟、崇禎年間或明末起，出現幾位繼起投入助刻藏經的人士，如吳江葉紹顥、休寧金聲、常熟毛晉（鳳苞）、當湖（平湖）馮洪業（1584-1661）、泰和蕭氏家族，但也多集中在明末之時，清初順治年間即使有所助刻，仍顯得乏力。

而與此同時，即明末清初，另一股推進刻藏事業進行的重要動力，是嘉興楞嚴寺擔負起施刻的重責大任，而非某個士家大族，自表一清楚可見。崇禎年間起，經費由楞嚴寺籌募，直到康熙年間，刊刻卷數大幅躍升。特別是清初順、康年間，嘉興楞嚴寺刊本為數眾多。顯示世變期間，投入嘉興藏刊刻的士人或士族明顯滑落，而楞嚴寺在此資源相對匱乏之際，則肩負起刻藏所需的大部分負擔。舉例觀之，弘光元年（1645）

█

<sup>139</sup> 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南天書局出版社，1987年，頁434、451。

<sup>140</sup> [美]魏斐德著，陳蘇鎮等譯，〈朝廷對縉紳特權的打擊〉，《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797-802。

嘉興楞嚴寺刊本《雪巖和尚語錄二卷》施貲刻文：「浙江嘉興府楞嚴寺經房餘貲刻此」，<sup>141</sup>順治十八年(1661)嘉興楞嚴寺刊本《南宋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一卷》施貲刻文：「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五百十八羅漢尊號」，<sup>142</sup>康熙十年(1671)嘉興楞嚴寺刊本《佛學考訓十卷》、《竹窗隨筆一卷二筆一卷三筆一卷》、《增集續傳登錄四卷》，施刻紀錄均載：「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本年坊貲刻」。<sup>143</sup>而在板藏流通方面，譬如「禾郡楞嚴寺般若坊藏板」，<sup>144</sup>「嘉禾楞嚴般若坊附藏流通」。<sup>145</sup>

又根據僧獨立性易(1596-1672)，〈乞緣大藏并及建閣言引〉(無著道忠抄稿以〈請藏建閣化緣引〉)亦可獲知順治、康熙年間嘉興楞嚴寺與刻藏的相關消息。僧獨立性易，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原名戴笠，字曼公，由於明清「鼎革之變，慘憤迫於胸」，於永曆七年（日本承應二年，1653）渡日。當僧隱元(1592-1673)於永曆八年(1654)東渡後，遂皈依隱元座下，成其弟子。<sup>146</sup>康熙二年，即日本寛文三年(1663)十一月一日載言：

■

<sup>141</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612。

<sup>142</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591。

<sup>143</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642、644。

<sup>144</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651。

<sup>145</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651、655；明·釋海明，《破山和尚語錄》卷20，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26，頁93b。

<sup>146</sup> 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685-686。

會當我明嘉隆間，法運闡珊，幸出雲棲蓮大師，開導江漢，得啟吳會名公，咸親法味，知有道在。時荷當湖家宰陸五臺先生，慨茲《龍藏》請頒匪易，敕制難從。遂與紫柏、憨山兩大師，創發書冊，流通天下，俾同《龍藏》經論錄外，附以代出禪宗語錄，合入藏函，垂光永永。板存杭郡徑山之兜率園，帙聚禾郡之楞嚴寺，大展法音，流布海宇，濟川市舶，以副覆載照臨之功，廣翼彌天之法運焉。……時寬文三年，遂次癸卯復月朔日。天閒野老獨立氏敬題。<sup>147</sup>

上文「板存杭郡徑山之兜率園，帙聚禾郡之楞嚴寺」。姑蘇兜率園為嘉興藏刻場之一，而杭州徑山化城寺是匯集四方經板統籌管理之處。<sup>148</sup>而「帙聚禾郡之楞嚴寺」之說，則再次顯示楞嚴寺為明末清初嘉興藏重要流通販售處。然有關明末清初楞嚴寺於嘉興刻藏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非本文論述重點，待日後另文究明。

至於鼎革世變之際，嘉興藏刊刻情形，按錢謙益，〈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記載：

庚子歲，壽光上人以律行推擇住持寂炤，嘉郡諸善信翕然傾化，謀襄盛舉。于是四方經版，若寒山趙氏、平湖馬氏、金沙于氏，咸輦輸輻輳歸于化城。壽光剖心佛前，誓捐軀盡年為可、開二大士了此弘願。海印弟子錢謙益乃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於乎是舉也，有四善焉。<sup>149</sup>

<sup>147</sup> 山本悅心，《黃檗東渡僧寶傳年表》，愛知縣：黃蘖堂，1941年，頁5；天閒野老獨立氏敬題，〈乞緣大藏并及建閣言引〉，錄自禪文化研究所藏無著道忠抄稿之複寫本史料編號189-446-3-10，收入徐興慶編著《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臺北：臺大出版社，2015年，頁116-117。

<sup>148</sup> 此處所謂徑山兜率園是否為僧獨立性易之誤植，猶待考究。

<sup>149</sup> 清·錢謙益，〈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牧齋有學集》卷41，《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391，頁405下。

壽光上人為道開法師之法侄，順治十七年(1660)住持寂照寺，承接刻藏大任。此時如錢謙益前述，各地經板未行集中管理，缺乏疏通、督導和指揮統籌的負責人及單位，是刻藏所面臨的難題之一，導致八十年間「經廠之琅函重閉，長干之蠹簡猶新」之流弊產生。「倘不及時整理，抑或任運凋殘，惜矣，劫灰哀哉。」「又況經本五千餘卷，似闕二百有零。刻資三萬餘金，今估二千以上。」如是刻經場運作停滯、經板腐蝕，經卷闕如、金額匱乏等，再再阻礙刻藏的進展。<sup>150</sup>

錢謙益為能使各地經板順利運送至化城寺（參照圖四、圖五、圖六），順治十八年(1661)春天，特地致函其同鄉友人王中恬父子，祈請免去由各地載運至化城寺途中所需繳納之關稅，並勸說中恬父子作為佛教護法。<sup>151</sup>〈與王中恬〉書信中述及：

茲有徑山壽光上人載經板過關門，輒以一言通於長公。蓋書本刻藏，乃紫柏大師及陳（陸）五台諸老未了公案，今已及什之八九，望為慇懃長公，發心唱導，為浮圖合尖之舉。八十年法門盛事，賢橋梓得收其成功，豈非靈山付囑一大事因緣耶。此僧真誠樸茂肩荷佛法，殊非緇衣稗販之流。<sup>152</sup>

又，〈與王楚先〉說道：

徑山壽光上人，律行高峻，此土真清淨僧也。近以載經板過關門，輒以一言為先容。不但求免榷稅，意欲求為金湯護法，了

1

<sup>150</sup> 清·錢謙益，〈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牧齋有學集》卷 41，《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406 下。

<sup>151</sup> 相關記事，可參考王彥明，〈錢謙益與《嘉興藏》考論〉，南京《新世紀圖書館》1，2013 年，頁 63。

<sup>152</sup> 清·錢謙益，〈與王中恬〉，《錢牧齋先生尺牘》卷 2，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頁 234-235。

大藏浮圖合尖之舉，庶幾現宰官身，不負靈山付囑耳。萬惟真切留意，勿以尋常緣法應付也。<sup>153</sup>

錢謙益為刻藏事所付出的心力，可自上述信函中一一得知。而此時相關士族參與刻藏之情，將分述於下。



圖四：杭州徑山腳下化城寺舊址（作者攝于 2017/07/21）



圖五：化城寺舊址正從事民宿之改建，正門入口處（作者攝于 2017/07/21）



圖六：據文獻與當地耆老口述，推估此一地帶應該是化城寺經板藏處，現改為民居。（作者攝于 2017/07/21）

### （一）平湖馮洪業家族

前揭錢謙益，〈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提及，順治十七年因著僧壽光住持寂照庵機緣，希望集中各地經板於徑山寂照庵統一管理。而此次經板多來自居士施刻，有平湖馬（馮）氏、寒山趙氏、金沙于氏之藏板。金沙于氏指的是金壇于氏家族，而平湖馬氏即是前舉當湖馮洪業。關於

¶

<sup>153</sup> 清・錢謙益，〈與王楚先〉，《錢牧齋先生尺牘》卷 2，頁 236。

馮洪業刻藏事蹟，前揭中嶋隆藏於〈所謂万曆嘉興大藏經の刊刻と馮洪業の助刻活動〉一文，有其詳細討論。包括對馮洪業家族及其援助廣大宗族和地方百姓的生活，以及對社會救濟的投入、對地方社會文化的維護、佛寺廟宇的修建，及佛典的刊刻等均行論述，並指出馮家擁有豐厚家產，是地方望族。同時詳細羅列馮洪業所施刻的各個刊本，及精算施刻金額。最後探討馮洪業施刻的背後精神，推測基於「利他」的心情，響應諸高僧、檀越募刻大藏經的呼籲，積極參與大藏經刊刻事業。<sup>154</sup>

馮洪業是明末重要的藏書家之一，方冊藏刊刻在當時備受江南藏書家所關注，圖一可見江南眾多刻工、抄書家參與其間的情形。<sup>155</sup>馮洪業參與刻藏，自表二可清楚看到是在明末時期，高達 203 卷。除受其熱心社會文化事業等利他精神的支撐外，對於藏書所涉抄書或刻書精美之喜好亦是重要因素。但入清以後助刻卷數大幅減少，僅見順治年間施刻 10 卷。至於入清以後馮洪業或馮氏家族發展的狀況，中嶋氏並未觸及。

《平湖縣志·馮洪業傳》載馮洪業，「字茂遠，萬曆乙卯，應天舉人」，「里中咸稱孝子。」<sup>156</sup>家財優渥，傳載：

<sup>154</sup> 中嶋隆藏，〈所謂万曆嘉興大藏經の刊刻と馮洪業の助刻活動〉，收入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頁 72-80。

<sup>155</sup> 另，可參照陳玉女，〈第四章 五臺嘉興藏刊刻緣起及其社會資源〉，《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表 4-1」，頁 177-185；同書，〈第五章 江南嘉興藏刊刻各階段的社會資源與願求〉，「表 5-1」、「表 5-2」、「表 5-3」、「表 5-4」、「表 5-5」、「表 5-6」，頁 245-265；王靜，〈第 3 章 《嘉興藏》雕版刻工研究〉，《《嘉興藏》雕版刻工研究》，北京：河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6 年，頁 59-87。

<sup>156</sup> 清·彭潤章等修，清·葉廉鍔等纂，〈馮洪業〉，《光緒平湖縣志》卷 1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93 年，頁 407 上。

洪業世家子，豐于財。掌管北郊別墅，曰耘廬。疏池築山，林木幽勝。中構曲房邃閣百十間，引水環之，集名士日賦詩飲酒其中，望者以為神仙。性尚義，輕施與，嘉平二邑學宮圯，各捐千金，助鼎新費。又捐田，惠宗族，供祠祭。修築漢塘五十里，行旅便之。他如賑飢療疫舍櫓檻衣帳，不可勝記。<sup>157</sup>

馮洪業熱衷於地方社會或宗族救濟的利他情懷，從葉紹袁的《甲行日注》亦能證實幾許。馮洪業與葉紹袁互為表兄弟，明亡，葉紹袁流亡至平湖，馮洪業不時給予接濟和照顧，時而邀請葉紹袁父子前往其耘廬別園。如順治四年(1647)六月二十三日葉紹袁與其子世信前往耘廬，葉氏記載耘廬：

荷花開數百朵矣，紅粧競語、艷香紛襲，不意亂離日有此佳境，別有天地，非人間也。<sup>158</sup>

耘廬可說是亂離中一處避世隱遁的幽靜之地，也是馮洪業與明遺民往來並予以接濟的重要據點。馮洪業父子與葉紹袁父子互動往來，頻見於《甲行日注》(見表三)。過著流離窘迫生活的葉紹袁父子，與仍是鉅富而過著寬裕生活的馮洪業父子，面對明亡，其無奈、苦悶與悲愴並無二致。葉紹袁記載順治五年(1648)閏三月十一日，馮洪業前來邀請，「與兒輩同往，孫元襄查來王在集天藻軒，追語平立，交相歎愴。」<sup>159</sup>而此時的馮洪業與葉紹袁同樣，早已易僧服掩蓋其反清復明的意志，即順治四年(1647)六月十一日葉紹袁寫著：「與侄信往當湖，馮茂遠亦僧服久矣。」<sup>160</sup>葉紹

## ■

<sup>157</sup> 清・彭潤章等修，清・葉廉鍔等纂，〈馮洪業〉，《光緒平湖縣志》卷 17，頁 407 下。

<sup>158</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 6，《明清史料彙編》第 3 集，頁 3161。

<sup>159</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 7，《明清史料彙編》第 3 集，頁 3210。

<sup>160</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 6，《明清史料彙編》第 3 集，頁 3157。

袁的表姪、馮洪業的兒子馮子近「亦僧服」。<sup>161</sup>這些以反清復明為職志的明遺民僧，互通聲息，亦承受著隨時被揭發或逮捕的壓力。<sup>162</sup>或許因為如此，入清以後，為僧之馮洪業父子應事相對低調而影響刻藏之舉。

故大約順治十七年左右，即錢謙益年將八十之際，為護持嘉興藏得以持續進行、早日完刻，全力支持壽光上人擔任主持刻藏大任的同時，亦熱切鼓勵周邊友人作為佛法金湯，持續護持刻藏，致書友人周安召，寫道：

經坊事魔強佛弱，全仗一二有心血人為末法作砥柱。仁兄可致鄙意力為贊成，……尚須邀朱子佩、馮茂遠諸公合力護持度紫柏老人一腔熱血，不致化作寒灰也。……壽光師能悉之。<sup>163</sup>

可見此時的馮洪業施刻之舉，確實非如往昔所擁有的盛情，明清鼎革是關鍵。

表三：「葉紹袁父子與馮洪業的往來」

順治四年六月十一日	與佺往當湖，馮茂遠亦僧服久矣。（《甲行日注》，卷6，頁3157）
順治四年六月十二日	訪表姪馮子近亦僧服。（《甲行日注》，卷6，頁3157）
順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佺侗往蘭溪，茂遠、子近來。（《甲行日注》，卷6，頁3160）
順治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與倌往耘廬。（《甲行日注》，卷6，頁3161）
順治四年七月十六日	適茂遠送酒至。（《甲行日注》，卷6，頁3166）
順治四年八月初二日	陸嗣安介潭，同子近來，嗣安僧服。（《甲行日注》，卷6，頁3170）
順治四年八月十四日	馮夫人送月餅新栗。（《甲行日注》，卷6，頁3172）
順治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訪陸嗣安，不值，返西疇。茂遠送米三石。倌歸，自武水有垂信至，安期病歿山中。（《甲行日注》，卷6，頁3176）

<sup>161</sup> 明·葉紹袁纂，《甲行日注》卷6，《明清史料彙編》第3集，頁3157。

<sup>162</sup> 陳玉女，〈流浪者之歌：明末遺民·移民的寺廟記憶〉，頁12-13。

<sup>163</sup> 清·錢謙益，〈與周安召五首〉，《錢牧齋先生尺牘》卷2，頁100。

順治四年九月十五日	謀貸於馮紀綱，茂遠知之，惠二十金，即為卒歲之資。 (《甲行日注》，卷6，頁3178)
順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與侄僉往耘廬。(《甲行日注》，卷6，頁3179)
順治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至子近齋中飲秋芥，甚佳。(《甲行日注》，卷6，頁3180)
順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僉往耘廬。(《甲行日注》，卷6，頁3183)
順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僉僉往耘廬。(《甲行日注》，卷6，頁3184)
順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馮夫人惠二金及秋芥一罇。(《甲行日注》，卷6，頁3187)
順治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見兒輩率崇孫往耘廬，茂遠惠崇二金。(《甲行日注》，卷6，頁3187)
順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茂遠又饋二十金、米六石為獻，春之需。(《甲行日注》，卷6，頁3193)
順治五年正月初七日	兒輩往耘廬。(《甲行日注》，卷7，頁3195)
順治五年正月初八日	兒輩自耘廬歸。(《甲行日注》，卷7，頁3196)
順治五年正月十二日	馮子近來。(《甲行日注》，卷7，頁3196)
順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茂遠攜酒過談。(《甲行日注》，卷7，頁3197)
順治五年二月初一日	與僉僉往耘廬，茂遠招也。(《甲行日注》，卷7，頁3199)
順治五年二月十二日	返西疇，茂遠惠酒二罇。(《甲行日注》，卷7，頁3200)
順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窘甚，又借茂遠二十金。(《甲行日注》，卷7，頁3202)
順治五年三月初三日	僉僉往耘廬即歸。(《甲行日注》，卷7，頁3202)
順治五年三月初十日	馮茂遠來。(《甲行日注》，卷7，頁3203)
順治五年三月十一日	僉僉往吳山汎掃并至汾湖拜奠母親櫬。余病不去，茂遠惠酒二罇，米二石、食物四種。(《甲行日注》，卷7，頁3204)
順治五年閏三月十一日	茂遠來招，與兒輩同往孫元襄查來王在集天藻軒追語平立，交相歎愴。(《甲行日注》，卷7，頁3210)
順治五年六月十九日	茂遠惠秋季二十金，米六石。(《甲行日注》，卷8，頁3226)
順治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茂遠寄黃偕令離隱歌。(《甲行日注》，卷8，頁3230)
順治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茂遠邀法華山尊宿航公(光明臺雪航)，同雲壑上人至。經元門之學，予與談金剛經。夜同年郭丹葵來，同飲。(《甲行日注》，卷8，頁3237)
順治五年九月十一日	茂遠送冬季之儀。又惠十金。(《甲行日注》，卷8，頁3238)
順治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廣平同金員嶠來，茂遠送紫河車膏。(《甲行日注》，卷8，頁3240)

## (二) 寒山趙宦光家族

寒山趙氏，相對於其他嘉興藏施刻者而言，鮮為人知，相關的文獻記載亦相當稀少。就筆者目前所查，唯於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中，找到一條記載：

《佛說大集法門經》一卷，萬曆三十五年(1607)吳郡寒山化城菴刊本，末行署「吳郡寒山迦羅越趙宦光凡夫氏校勘音釋刊定」，「進賢洪以信書，溧水楊應元刻／明萬曆丁未七月望日吳郡寒山化城菴刻」。<sup>164</sup>

載明寒山趙氏，即是吳郡寒山趙宦光。根據相關文獻與研究指出，趙宦光(1559-1625)是晚明有名的蘇州藏書家、抄書者，名士望族之後，擁有寒山別業，是名士聚集交會之所。(清)陸費墀(1731-1790)，〈金石林緒論〉載曰：

臣等謹案《寒山帚談》二卷附拾遺表論共一卷，明趙宦光撰。宦光，字凡夫，吳縣人，隱居寒山之陽，因以為號。<sup>165</sup>

《寒山帚談》為趙宦光關於書法評論之作。宦光逝世後，其子與刻藏關係如何，不甚清楚。但根據前揭〈募刻大藏方冊圓滿疏〉所提，寒山趙氏經板亦是重要刻板，藏有此經板者，當為趙宦光之後。趙氏家族於明清之際助刻嘉興藏屬實，且不應僅止於一卷，但多少不明，故未於表二列其家族之名及其助刻卷數。

錢謙益，〈趙靈均墓誌銘〉載，趙靈均為趙宦光之子，深受其父書

||

<sup>164</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291-292。

<sup>165</sup> 清·陸費墀，〈金石林緒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上。

畫金石鑑賞之薰陶，趙氏父子或說趙氏家族，含家族中的女性，在明末江南文人名流之中享有高雅盛名。錢謙益寫著：

君諱均，字靈均，姓趙氏。父宦光，毀家葬父，偕其配陸卿子隱于寒山之丙舍，世所謂趙凡夫者也。家世在凡夫誌中。<sup>166</sup>

趙靈均娶文徵明之後文彥可之女文端容，亦是名士之後。趙靈均幼時曾受學於文彥可，又從其父傳授「六書之學」，「父子自相講習」。端容則「明詩習禮」，富書畫才能，深獲趙宦光讚賞，稱此賢婦在，「寒山一片石，可以無恙矣。」故趙宦光歿後，「靈均家益落」，但「賓客益進，其弛置自便，視流俗如糞洩日益甚。」寒山別業以趙氏家族的文藝才華博得高品味之流的位階與美名，也因此贏得各地名流仕女的匯流，「遠近購者填塞」，為的便是文端容的《湘君搗素》、《惜花美人圖》。而「貴姬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法」。文端容逝世於崇禎七年(1634)，趙靈均逝世於十三年(1640)，然「靈均無子，以從弟之子鋐為後。一女曰昭，嫁平湖馬（馮）氏。」<sup>167</sup>趙氏家族與前述平湖馮氏有著聯姻關係，可見名士之間通過婚姻締結相互之間的人際網絡。

趙鋐入嗣為趙靈均之後，於明清鼎革之際死於兵難之中，〈趙耀傳〉載：

均無子，以從兄學基之子鋐為嗣。鋐字漢文，明諸生，不能續繼業，棄山泉廬舍，席捲所有以東歸。乙酉客帝入主，嘉定

1

<sup>166</sup> 清·錢謙益，〈趙靈均墓誌銘〉，《牧齋初學集》卷 5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651 下。

<sup>167</sup> 清·錢謙益，〈趙靈均墓誌銘〉，《牧齋初學集》卷 5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14，頁 652 上。

被屠。八月清師李成棟屠璜，殺人如麻。鋗及兄鋐俱罹難，時氏一家死於兵者二十二人。鋗無子，……。<sup>168</sup>

嘉定屠城慘狀已如前述，趙氏家族在此戰亂中罹難眾多，而寒山別業也在明清鼎革戰亂中面臨產權與轉型的經營問題。<sup>169</sup>可見趙氏家族於明清鼎革前後遭逢如此重大變故，造成其助刻之情的消散，勢所難免。

### （三）常熟毛晉家族

根據表二，明末江南知名藏書家、刻書家、出版家毛晉（鳳苞，1599-1659），亦積極投入刻藏事業，於崇禎年間施刻 134 卷，歸類於年代未確知的明末則施刻 18 卷，合計 152 卷之多。<sup>170</sup>關於毛晉施刻卷數，學界說法不一，因為研究者所根據版本有異，誠如毛文鼈明確指出的：

毛晉捐資施刻與參與校對《嘉興藏》的種數因整理者、研究者所見底本不同，故各有出入，甚至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同一部《嘉興藏》，楊良玉前曰：“據大藏牌記所載，他校刻的藏經至少有二百七十餘種”，而章宏偉後云：“毛晉捐資刻 63

<sup>168</sup> 清·趙耀，〈趙耀傳〉，《寒山留緒》，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 39，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頁 313。

<sup>169</sup> 相關的問題，詳細可參見江曉斐，〈第三章 變局與轉型：清初時期的寒山景況〉，《明清之間江南園林文化的變遷：以趙氏寒山別業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28-36。

<sup>170</sup> 周彥文，〈第五章 附錄〉羅列毛晉父子捐資代刻之佛典書目，可提供參考，《毛晉汲古閣刻書考》，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124-127；陳冠至，〈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1，2009 年，頁 128；毛文鼈，〈毛晉與僧侶之交遊及刻經考〉，成都《宗教學研究》4，2011 年，就毛晉刻經緣由及其對明清佛教的意義有著具體的分析，頁 255-256。

種藏經……參加了 180 種經文的校對”，令人費解而無所適從。<sup>171</sup>

故本文前述統計毛晉施刻卷數亦僅供參考而已。

毛晉不僅施刻，亦從事經典校正、刻經等業務。在上述匯集四方經板送至化城寺，由壽光上人運籌帷幄，毛氏的經板亦在此送歸行列之中，即錢謙益稱：「今毛氏經板已一送歸化城，合算已得什之八九，正浮圖合尖之日」。<sup>172</sup>又言：「虞山經板壽光師已料理入山，浮圖合尖。」<sup>173</sup>虞山經板，指的是毛晉的虞山華嚴閣刻經坊之經板。毛晉被譽為「明末清初一鉅大之出版家」，<sup>174</sup>嘉興刻藏在當時江南出版業中可說是一大盛事，毛晉對其關注當屬必然。

除此，毛晉大力贊助刻藏事業，與其本身學佛，與江南士人、緇流人士密切往來相關。毛文鼈，〈毛晉與僧侶之交遊及刻經考〉一文，分析其所以與僧人往來，在於探查「廟宇梵刹處罕見之函冊」，「使所刻書之內涵得以擴充，種類增富，版本價值亦隨以提升。」<sup>175</sup>也提及「毛晉為錢謙益白衣弟子，與錢曾儼然左右護法」。<sup>176</sup>筆者亦認為毛晉投入刻藏行列，錢謙益的推波助瀾有其關鍵性。若前述，由毛晉後人響應錢謙益倡導將四方經板送歸化城寺，委由壽光上人統籌管理之舉，亦可得知。

毛晉參與刻藏，於錢謙益，〈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略有所述。即

1

<sup>171</sup> 毛文鼈，〈毛晉與僧侶之交遊及刻經考〉，註 29，頁 255。

<sup>172</sup> 清・錢謙益，〈與黃觀止〉，《錢牧齋先生尺牘》卷 2，頁 134。

<sup>173</sup> 清・錢謙益，〈與周安召五首〉，《錢牧齋先生尺牘》卷 2，頁 100。

<sup>174</sup> 周彥文，〈緒言〉，《毛晉汲古閣刻書考》，頁 3。

<sup>175</sup> 毛文鼈，〈毛晉與僧侶之交遊及刻經考〉，頁 251。

<sup>176</sup> 毛文鼈，〈毛晉與僧侶之交遊及刻經考〉，頁 252。

嘉興藏函刻憨山大師《法語》僅止五卷，順治十三年(1656)，「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楗椎告眾，訪求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自讐勘，撰次為四十卷。」<sup>177</sup>憨山大師《夢游集》原本初傳於武林天界寺，覺浪和尚(1592-1659)得而見之，嘆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遂「亟草一疏，唱導流通。」毛晉則「請獨任鏤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子褒表，辰聿追先志，遂告成事。」<sup>178</sup>順治十五年左右，錢謙益的〈毛子晉六十壽序〉寫到：

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成，海內知交，彫（凋）謝道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者。唯毛子晉契闊相存，不以老髦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余西垂之歲，塊狀獨處，其與子晉過從，晤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sup>179</sup>

又曰：

吾友蕭伯玉、范質公議藏《大藏》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爝火，照四含而鏡三宗，子晉獨躊躇印讚，以為希有。<sup>180</sup>

又曰：

今吾與子晉委心法門，一鐙迢狀懸鏡相對，以多生文字結習，迴向般若餘季末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為子晉壽也矣。……今將偕一二名僧遺民往修故事，恐子晉之或避匿也。<sup>181</sup>

<sup>177</sup> 清·錢謙益，〈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收入明·釋德清，《憨山大師全集》卷首，《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頁 377c。

<sup>178</sup> 清·錢謙益，〈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頁 378 下。

<sup>179</sup> 清·錢謙益，〈毛子晉六十壽序〉，《牧齋有學集》卷 23，《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226 下。

<sup>180</sup> 清·錢謙益，〈毛子晉六十壽序〉，《牧齋有學集》卷 23，《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227 上。

錢謙益與毛晉的師生情，又同為潛心佛法之道友，拉近兩人同為刻藏付出心力的深邃情感。所謂：「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子晉獨踽躍印讚，以為希有」之言，若對照吳梅村(1609-1671)的〈蕭孟昉五十壽序〉，或可知悉毛晉「願荷擔續佛慧命」之幾許緣由。序言蕭孟昉為「故太常卿伯玉先生之猶子也。」蕭伯玉生前與錢謙益交往密切，築有春浮園，「有經史萬卷，穿穴講貫於弗倦，又能闡釋教乘，與縕衲往還相扣擊。」吳梅村回憶：

往者神廟盛時，吾吳如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吉水如鄒忠介公，紹續微言，倡明絕學，而憨山、紫柏二大師唱演宗風於吳會、豫章之間，兩地之學者習其義而盛其傳，雖千里之遙，猶同堂也。……紫柏刻《大藏》方冊於吳中，卷帙未半，其時有吳中毛子晉謀續之，伯玉與兩弟發願藏事，經營佽助之尤力。<sup>182</sup>

此處所言，便是錢謙益稱毛晉願意擔荷續佛慧命的原委。毛晉施刻或從事校對、鐫刻佛經等多在崇禎十五、六年(1642-1643)。而上述蕭伯玉，名士瑋，江西泰和人。自表二得見泰和蕭氏家族亦於此時大力贊助刻藏，高達 235 卷。蕭伯玉施刻經典，大多委由毛晉校對、虞山華閣誌記；舉如崇禎十五年，毛晉施刻《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一卷》，牌記：

常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全卷，東塔寺釋道源、海隅信士戈汕同對，崇禎壬午仲夏虞山華嚴閣識。<sup>183</sup>

又同年施刻《佛說四備經一卷》，牌記：

¶

<sup>181</sup> 清・錢謙益，〈毛子晉六十壽序〉，《牧齋有學集》卷 23，《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91，頁 227 上。

<sup>182</sup> 清・吳偉業，〈蕭孟昉五十壽序〉，《梅村集》卷 25，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438，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184 上-下。

<sup>183</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 4，頁 143。

常熟信士毛鳳苞捐俸刻《佛說四備經》全卷，東塔寺釋道源、海隅信士戈仙同對，崇禎壬午仲夏虞山華嚴閣識。<sup>184</sup>

十六年毛晉所施刻者，題記內容亦大致如上。而泰和蕭士瑋施刻佛經大多在崇禎十五年，例如施刻《七佛所說神咒經四卷》，牌記：

泰和信官蕭士瑋捐俸刻《七佛所說神咒經》全部，東塔寺釋道源、東湖信士毛晉同對，崇禎癸未孟冬虞山華嚴閣識。<sup>185</sup>

同鄉信士楊仁愿大多施刻於崇禎十六年，牌記：

泰和信官楊仁愿捐俸刻《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全部，東塔寺釋道源、東湖信士毛晉同對，崇禎壬午仲夏虞山華嚴閣識。<sup>186</sup>

無庸置疑，虞山華嚴閣成為明末嘉興刻藏的重要經坊之一，毛晉擔荷續佛慧命的重要任務，積累相當數量的經板，體現毛晉承諾擔荷續佛慧命的實踐心力。然過程中曾面臨難以為繼的經濟困頓，錢謙益的〈與侯月鷺〉信函中談到：

村莊多暇，訂正金剛、楞嚴二疏，已付梓人矣。因毛子晉去歲捐館，家計倥偬，刻費未能相繼，不得不為勸募之計。<sup>187</sup>

毛家財力，如上所見，贊助刻藏已出現難以賡續的困境。入清後，即「至國朝初年，家亦因此中落。」<sup>188</sup>如此對刻藏所能施出的贊助極為有限。

■

<sup>184</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146。

<sup>185</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140。

<sup>186</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4，頁294。

<sup>187</sup> 清·錢謙益，〈與侯月鷺〉，《錢牧齋先生尺牘》卷2，頁86。

<sup>188</sup> 清·徐康，〈汲古閣〉，《前塵夢影錄》卷下，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冊97，臺

順治之後，康熙年間則未再有晉氏家族之施刻紀載。

#### （四）金聲家族

再如前述金聲(1589-1645)，字正希，世居徽州休寧。父親金文耀，客商於湖廣嘉魚縣。隆武元年，即順治二年清軍渡江，金聲時任兵部右侍郎，五月南京戰敗，十月受刀而死。其子金敦涵，逃亡閩地。金聲家族的遷移離散，可見一斑。<sup>189</sup>天啟七年(1627)，金聲曾助刻海陽清淨禪林刻場所負責刊刻嘉興藏版《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的第 15 卷，記載：

休寧縣佛弟子金聲捐貲刻此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第十五卷，以斯功德上祝，普願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毘盧性海。匡山五乳侍者廣益對，錢唐陶一霖書。<sup>190</sup>

大約同時，金聲同鄉休寧縣有多位信士亦相繼助刻《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各卷，分別為天啟六年(1626)的程有學助刻卷 1，及七年的程有路助刻卷 11、夏繼邦助刻卷 12、13、金相助助刻卷 14，而程開世、程開祚、程開裕、程開祺分別助刻卷 16 至 19，崇禎元年(1628)年程開第則助刻卷 20。雖不能從文獻確知程有學與程有路，或程開世與程開祚等人是否擁有親兄弟關係，但同是程氏宗族的可能性可以被推測與想像。《居士傳》記載金聲：

字子駿，湖南嘉魚人，少從父遊於休寧家焉。……年二十六學佛法，習靜古刹中。一日食茄而甘，遂長齋。其友程開祚就正希飯，怪其斷肉也。問所繇，正希與之言佛法。開祚心動曰：

¶

北：藝文出版社，1966 年，頁 9。

<sup>189</sup> 清·朱溶撰，〈金聲傳〉，《忠義錄》卷 3，《明清遺書五種》，頁 541-543。

<sup>190</sup>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卷 15，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14，頁 88。

是信然。向吾與子僅一世朋友耳，不知前後乃有無量世也。今與子重定交。遂棄所學而學焉。<sup>191</sup>

此處載明，程開祚是金聲的友人，金聲開啟了程開祚學佛的因緣，兩人又同是休寧縣人。可見金聲與同鄉的程開世、程開裕、程開祺等似屬相識之人，如是士人借助鄉族或友朋的人際網絡捐資，以贊助嘉興藏刊刻，應是晚明以來江南一帶支持該藏持續進行的重要路徑。

然如前述，明清鼎革的動盪造成金聲本人的喪亡及其家族的離散。傳載順治二年清軍攻下南京，金聲被逮捕時，途中致書信與其長兄，說道：

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受之，不必逃避。我家為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即流離散亡者，亦流離散亡得其所。<sup>192</sup>

金聲寬慰其兄為國事而逢此家變，縱有死難與家變仍適得其所，並且抒發自身能夠坦然面對此一大變局，端賴修學佛道之故。同時信中，讚揚其女兒於「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急即譽火自焚，此真學道人。」因此鼓勵其兄長「仍時以佛法提撕，一切乃為來生大留種子耳。」<sup>193</sup>而在寫給其長子的書信中，亦囑咐逢此國難當處變不驚。寫道：

¶

<sup>191</sup> 清·彭紹升，〈金正希傳〉，《居士傳》卷 5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86，頁 584 上。

<sup>192</sup> 清·彭紹升，〈金正希傳〉，《居士傳》卷 52，《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86，頁 586 上。

<sup>193</sup> 清·彭紹升，〈金正希傳〉，《居士傳》卷 52，《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86，頁 586 上。

我往南京去，道炤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候我南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所者多矣。<sup>194</sup>

釋道照乃金聲之女，「少長齋」，國難時，「遂剪髮屏居，已而之靈巖參繼起禪師」，「後參（杭州）靈隱巨德禪師有省」。<sup>195</sup>此外，「還結夏華山，依蘂菴禪師以居」。蘂菴禪師(1598-1676)即是金聲好友熊魚山(開元)，亦是嘉魚人，同是錢謙益友人，「其家故奉佛」。傳載：「初魚山與同邑金正希友善，切劘大事，忠憤出於至誠。」<sup>196</sup>唐王立於閩地，封魚山為工科給事中，後魚山因「病乞休，寓汀州。」順治三年(1646)汀州「城破，遂為僧。更名正志，號蘂菴。得法於（蘇州）靈巖繼起禪師，隱於（蘇州）蓮華峯翠巖寺。老於虞山（江蘇常熟虞山）」。<sup>197</sup>《研堂見聞雜記》載蘂菴和尚，於崇禎十七年明亡之際：

公與金公正希同舉義師，志圖恢復。金戰死，公迺削髮為浮屠，棲吳郡之靈巖山。順治乙未，募米至沙溪，頽然老僧矣。未幾，主席於虞山之三峰。<sup>198</sup>

魚山出家後，以蘇州附近一帶為其活動據點。其師弘儲繼起

I

<sup>194</sup> 明・金聲撰，〈與長男（乙酉）〉，《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卷 5，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冊 50，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末邵鵬程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561。

<sup>195</sup> 清・彭紹升，〈金正希傳〉，《居士傳》卷 52，《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86，頁 586 上。

<sup>196</sup> 清・彭紹升，〈熊魚山傳〉，《居士傳》卷 52，《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86，頁 586 下。

<sup>197</sup> 清・彭紹升，〈熊魚山傳〉，《居士傳》卷 52，《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86，頁 587 下。

<sup>198</sup> 清・不著撰人，《研堂見聞雜記》，《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5 輯，頁 58-59。

(1605-1672)開法蘇州靈巖，志士詩人多與其交遊，「熊開元為其高弟」；<sup>199</sup>「夫山繼起，後嗣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碓庵僧鑒青，皆繼起弟子。」<sup>200</sup>而弘儲繼起亦是金聲女兒道照所依止之法師。魚山出家後的活動範圍，與其師弘法場域密切相關。而金聲家族的死難與離散，以及江南士人的逃頓，再再致使嘉興藏刊刻的支援網絡受到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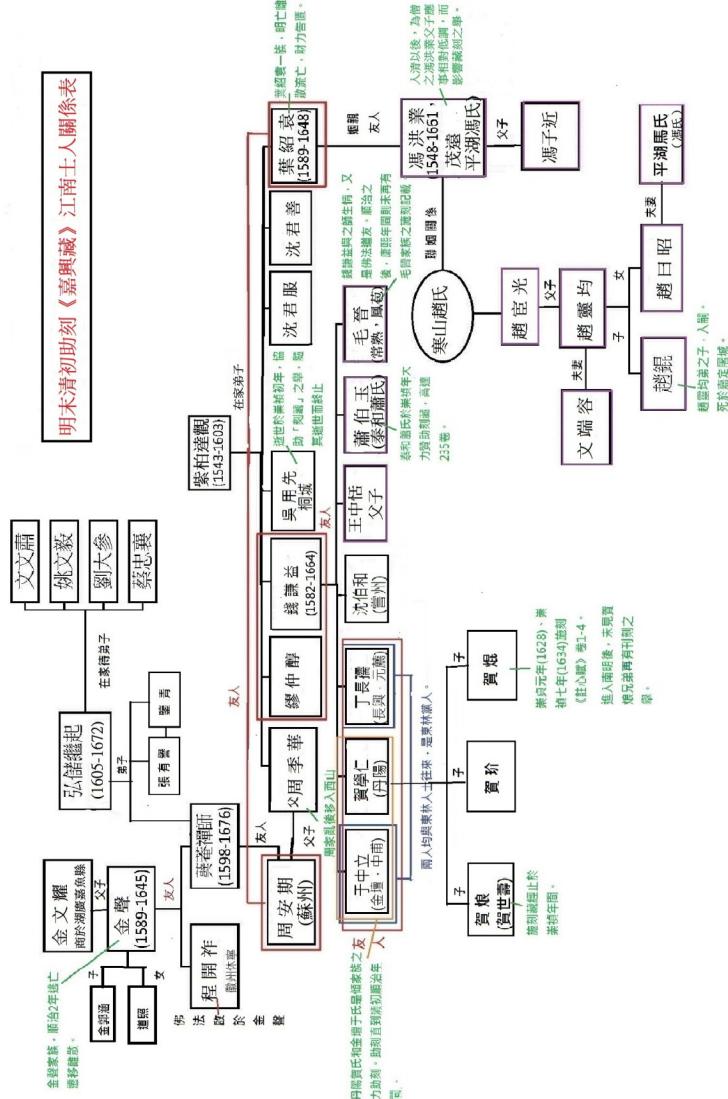
走筆至此，從晚明萬曆年間刻藏開始即已投入助刻的士人及其家族，其刻藏志業有延續至明清鼎革者，也有自明末始參與助刻者。然明清鼎革造成無數江南士族的死傷與亂離，其直接間接都影響著嘉興藏刊刻的進展，具體現象已梳理如前。而以上所有士人家族之間的人脈關係，如表四：「明末清初助刻《嘉興藏》江南士人關係」所示，可清楚勾勒明清之際江南士族施刻嘉興藏的支援網絡。當此網絡被鼎革戰亂給沖散、瓦解，則刻藏面臨何時完刻的難題必然再度浮現。



<sup>199</sup> 卓爾堪清·選輯，《明遺民詩》卷 16，收入沈雲龍編輯《明清史料彙編》冊 78，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頁 1479。

<sup>200</sup> 陳垣，〈二 晦山天王碑諍〉，《清初僧諍記》卷 1，收入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38。

表四：「明末清初助刻《嘉興藏》江南士人關係」



## 五、結語

據上述，得以廓清明清鼎革時期社會政局的大變動，造成江南仕紳家族的崩離，進而衝擊長期護持嘉興藏刊刻的士人甚或家族，使得江南士人在刻藏人力、財力和物力可互通有無的支援網絡因之潰散，導致刻藏事業的難以相續，甚而致使某些刻經場運作停滯及其經板管理不善的種種流弊。

萬曆年間刻藏開始，至清順、康年間，隱約可見施刻江南士族之間似乎都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如婚姻、親族、友人、師生門第等層層關係，連結成江南刻藏的社會支援系統。但因鼎革戰亂的襲擊，讓純由民間私人發起的這份刻藏事業，原屬經營不易的狀況，使其更陷入窘困，致使刻藏進程越趨嚴峻。而前後護持刻藏的士族，有從萬曆刻藏伊始便贊助至明末，甚有延續至明清鼎革以後，然多因家族離散而喪失施刻能力。譬如吳用先、周季華父子、金壇于氏家族和丹陽賀氏家族，可說是護持刻藏的原始士人家族。隨著這些家族勢力的消逝，於天啟、崇禎、明末年間繼起參與護持的士族，有平湖馮洪業家族、寒山趙靈均家族、虞山毛晉家族、泰和蕭伯玉家族、楊仁愿家族、徽州金聲家族等，於明清政權鼎革前後，合力協助統整社會動盪下散置四處的經板及贊助幾乎面臨停滯的刻藏事業使其得以賡續。而居間聯繫、積極倡議鼓吹，以期擴大護法人脈圈的，錢謙益是重要人士之一。但這些助刻家族也隨著新舊政權的動盪，造成如馮氏家族的隱遁、趙氏家族因嘉定屠城而死於兵變、毛氏家族入清後財力匱乏等現象，導致刻藏的不穩定。

入清以後，如前述所見，嘉興楞嚴寺明顯擔負起刻藏的大半責任，與居士刊本卷數旗鼓相當，又有過之。可以說，取代了以往士族施刻大部分經卷的情形，楞嚴寺自崇禎年間逐漸行施刻之舉，特別是在清順治、康熙年間的大力承擔。此時雖不乏繼起的士人施刻，但楞嚴寺的捐

資刻藏確實占居重要力量，是續藏、又續藏刊刻的重要時期。至於嘉興楞嚴寺藏經刻、印、販售、流通等管理經營，及其與中央政權和地方仕紳之間的關係，以及在整個刻藏過程中被僧俗二界所賦予的功能角色，未來將進行更詳實的解析，以期逐步勾勒明清嘉興刻藏之全貌。



## 引用書目

- 《法華經安樂行義》，北魏·釋慧思，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大般涅槃經疏》，隋·灌頂，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涅槃經玄義發源機要》，宋·釋智圓，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3，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明太宗，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6，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唐·澄觀撰述，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12，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唐·實叉難陀譯，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14，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註心賦》，宋·釋延壽，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0，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禪宗正脈》，明·如壹集，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0，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成唯識論俗詮》，明·釋明星，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1，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護法錄》，明·宋濂，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1，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憨山老人年譜自敘實錄》，明·釋德清，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憨山大師全集》，明·釋德清，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2，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紫柏尊者別集》，明·釋真可，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密藏開禪師遺稿》，明·釋道開，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3，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破山和尚語錄》，明·釋海明，收入《明版嘉興大藏經》冊 26，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清·釋永覺撰，清·釋道霈重編，收入《徑山藏》編委會《徑山藏》冊 168，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2016。
- 《紫柏尊者全集》，明·釋德清，收入《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冊 73，台北：白馬精舍印經會，出版年不詳。
- 《五石脂》，清·陳去病，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上冊）》，徐興慶編著，臺北：臺大出版社，2015。
- 《日知錄》，清·顧炎武，收入《清代學術筆記叢刊 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 《石匱書後集》，明·張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320，上海：上海古籍，2002。
- 《甲行日注》，明·葉紹袁，收入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第 3 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民國重修金壇縣志》，馮煦纂修，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江南聞見錄》，明·不著撰人，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中國野史集成》冊 33，成都：巴蜀書社 1993。
- 《江陰城守紀》，清·韓菼，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中國野史集成》冊 33，成都：巴蜀書社，1993。
- 《江上孤忠錄》，清·黃明曦纂，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中國野史集成》冊 33，成都：巴蜀書社，1993。
- 《光緒平湖縣志》，清·彭潤章等修，清·葉廉鍔等纂，上海：上海書店出版，1993。
- 《西陂類稿》，清·宋犖，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金壇獄案》，清·計六奇，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冊 27，成都：巴蜀書社，2000。
-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明·金聲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冊 5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東塘日劄》，明·嘉定朱子素九初述，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4，北京：中國書店，2000。
- 《明史》，清·張廷玉，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忠義錄》，清·朱溶，收入明·江垓，清·解瑤等撰，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6。
- 《居士傳》，清·彭紹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冊 12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季南略》，清·計六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明遺民詩》，卓爾堪清·選輯，收入沈雲龍編輯《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 《牧齋有學集》，清·錢謙益，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391，上海：上海古籍，2002。
- 《牧齋初學集》，清·錢謙益，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冊 11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前塵夢影錄》，清·徐康，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冊 97，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
- 《南明野史》，清·南沙三餘氏，收入《明清史料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研堂見聞雜記》，清·不著撰人，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5 輯，臺北：臺灣大通，1987。
- 《徑山志》，明·宋奎光，收入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冊 31，臺北：明文書局，1980。
- 《浙東紀略》，明·徐芳烈，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員會《中國野史集成》冊 33，成都：巴蜀書社，1993。
- 《桐城舊耆傳》，清·馬其昶，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梅村集》，清·吳偉業，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冊 438，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密藏禪師遺稿》，明·釋道開，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冊 15，合肥：黃山書社，2005。
- 《陶庵夢憶》，明·張岱，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冊 4，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臺北：國家圖書館，2000。
- 《清初僧諍記》，陳垣，收入陳智超主編《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 《揚州變略》，明·無名氏，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明清筆記史料叢刊·清》冊 56，北京：中國書店，2000。
- 《揚州十日記》，清·王秀楚，臺北：廣文書局，1966。
- 《葉天廖年譜》，明·葉紹袁，收入《嘉業堂叢書》冊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葉天廖年譜續》，明·葉紹袁，收入《嘉業堂叢書》冊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寒山留緒》，清·趙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 39，上海：上海書店，1994。
- 《粵游見聞》，明·瞿共美，收入《明清史料彙編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萬曆野獲編》，明·沈德符，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鄧尉山聖恩寺志》，清·金天羽，收入《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44，臺北：明文書局，1980。
- 《錢牧齋先生尺牘》，清·錢謙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繹史摭遺》，清·李瑤，收入《明代傳記叢刊》冊 105，臺北：明文，1991。
- 《鐵眼禪師遺錄》，釋鐵眼，收入《黃檗鐵眼版一切經》，日本昭和癸巳年(1953)黃檗山寶藏院刊本。
- 丁志可主編，2008，《明朝遺民的大清歲月》，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發行。
- 小野和子編，1996，《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山本悅心，1941，《黃檗東渡僧寶傳年表》，愛知縣：黃蘖堂。
- 中嶋隆藏，2004，〈所謂万曆嘉興大藏經の刊刻と馮洪業の助刻活動〉，收入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東京：二玄堂，頁 69-81。
- 木宮泰彥，1980，《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毛文鼈，2011，〈毛晉與僧侶之交遊及刻經考〉，《宗教學研究》4，頁 250-255。
- 王成勉，2012，《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臺北：黎明文化。

- 王彥明，2013，〈錢謙益與《嘉興藏》考論〉，南京《新世紀圖書館》1，頁 61-64。
- 王靜，2016，《《嘉興藏》雕版刻工研究》，北京：河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 王鐵男，2015，〈以抗清鬥爭為主線的南明史研究新視角□ 評顧誠《南明史》〉，《湖北函授大學學報》16，頁 90-96。
- 司徒琳，2007，《南明史 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白一瑾，2010，《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吉尾寬著，2001，《明末の流賊反乱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店。
- 寺田隆信，2009，《明代鄉紳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 江曉雯，2012，《明清之間江南園林文化的變遷：以趙氏寒山別業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伯重，2002，《發展與制約□ 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北：聯經出版。
- 周彥文，2006，《毛晉汲古閣刻書考》，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 孟森，1987，《明清史論著集刊》，臺北：南天書局出版社。
- 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編，1989，《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 岸本美緒，1999，《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南炳文，2012，《南明史》，北京：故宮出版社。
- 范金民，2012，《江南社會經濟史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徐茂明等著，2011，《明清以來蘇州文化世族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章宏偉，2016，〈明代萬曆年間江南民眾的佛教信仰□ 以萬曆十七至二十年五臺山方冊藏施刻文為中心的考察〉，《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31，頁 111-126。
- 陳玉女，1997，〈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 兼論佛、道兩勢力的對峙〉，《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23 號，頁 195-245。
- 陳玉女，2010，《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臺北：稻鄉出版。
- 陳玉女，2015.8.4，〈流浪者之歌：明末遺民・移民的寺廟記憶〉，上海：中國佛學院，北京大學佛教典籍與藝術研究中心，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

- 學論壇，上海玉佛禪寺合辦，「東亞寺院的社會性功能國際研討會：淑世超邁出世，紐帶多過界分□ 佛教與東亞宗教寺院的多重社會作用與功能」。陳冠至，2009，〈明代江南士人的抄書生活〉，《國家圖書館館刊》1，頁 115-143。陳學文，2010，〈筆路藍縷的三十年□ 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收入王家范主編《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 1978～2008》，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3-25。
- 森正夫，1981，《奴変と抗租：明末清初を中心とする、華中・華南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民衆の抵抗運動》，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
- 馮玉榮，2011，《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馮賢亮，2002，《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 黃海章，1987，《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福本雅一，2012，《明末清初》，京都：藝文書院。
- 趙伯陶，2002，《秦淮旧梦：南明興衰錄》，濟南：濟南出版社。
- 趙園，1999，《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衛匡國著，何高濟譯，2008，《韃靼戰紀》，收入帕萊福等著《韃靼征服中國史・韃靼中國史・韃靼戰紀》，北京：中華書局。
- 賴惠敏，1991，〈士族的形成與興衰□ 若干個案的研究〉，收入中央大學共同科編印《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377-438。
- 錢海岳，2006，《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店。
- 薛文郎，1991，《清初三帝消滅漢人民族思想之策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謝國楨，1980，《明末清初的學風》，臺北：谷風出版社。
- 韓錫鐸，2015，〈重輯《嘉興藏》及未盡事宜〉，《刻本大藏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藍吉富，1991，〈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頁 255-266。
- 〔美〕魏斐德著，陳蘇鎮等譯，1998，《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顧誠，2011，《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2017/10/25，<http://taipei3.cbeta.org/jiaxing.php>。

- Harry Miller. 2013. *State versus Gentry in Early Qing Dynasty China, 1644-169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ynn A. Struve. 1984.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ynn A. Struve. 1998.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Mich: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